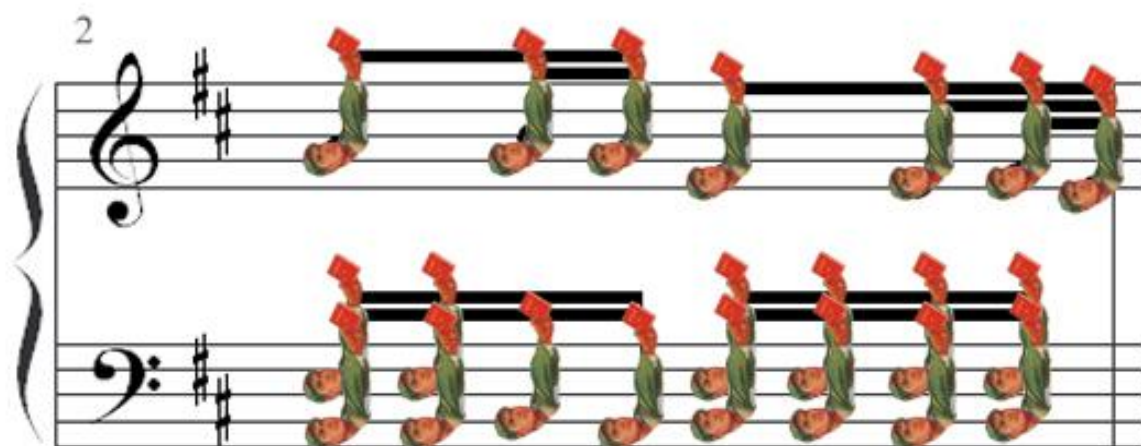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0月15日第27期 总第23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7期

目 录

【专稿】

傅 蓓 文革文化中的视听艺术

——《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读后

【评论】

啟 之 《桥》：自力更生与民族主义

【书摘】

何 方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国际形势

【述往】

韦文德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一）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

王 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下）

李南央 我的俄罗斯梦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英国特嫌

【封面说明】

邹 行 红色五线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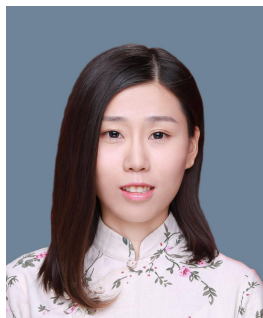
【读者来信】

1. 成 岗：《前世与今生》中关于“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解释有误

2. 皮皮侠：为文浩之书叫好，为陆凌之文点赞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傅蔷 吉林长春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核物理）专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博士论文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以及面向工人的文教宣传活动。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攻读第二博士，博士论文关注中学生文革、文革暴力史以及权力结构中的性别因素。独立发表作品：

1. 《书写“劳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文艺中的底层视角——以围绕话剧《装卸》的批评为例》载《华夏文化论坛》，2017年02期；

2. 《从文化反哺到底层污名——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与“小镇青年”叙事衍变》载《新闻界》，2018年06期；

3. 《主体的隐匿：“互联网思维”下的工人诗篇》，载《青年记者》，2017年12期；

4. 《从媒介批评到“读者代表”：从《纽约时报》“公共编辑”制度谈起》，载《中国记者》，2016年12期；

5. 《国外深度报道的融合发展之路》，载《青年记者》，2017年22期；

6. 《暖新闻在美国》，载《青年记者》，2016年22期；

与人合著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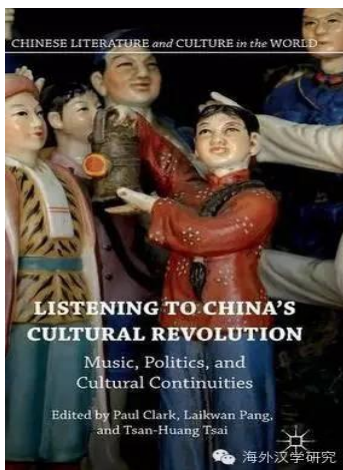
1. 沙垚、付蔷，《实践中的人民性：“送戏下乡”与“群众艺人”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农村的戏曲民族志》，载《开放时代》2018年05期；

2. 沙垚、付蔷（Yao Sha&Qiang Fu），《中国农村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实现社会主义新途径：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村戏剧的民族志研究》（*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in practice and means to actualize a new socialist culture in rural China: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drama in Shaanxi's rural regions in the 1960s*），《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9, Issue 1.）

文革文化中的视听艺术

——《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读后¹

傅 嵩



这是一本探讨文革文化的论文集，由康浩（Paul Clark）、彭丽君（Laikwan Pang）、蔡灿煌（Tsan Huang Tsai）三人主编，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2015年出版。从内容上看，书如其名，主标题中的“倾听”一词突出了全书对听觉文化、听觉研究的倚重；副标题中的“音乐”、“政治”可谓全书之魂，音乐政治学或文艺政治学可作为书中许多论文的关键词。但全书并不限于对文革音乐和听觉文化的探讨，还涵盖了电影、剧场、影像的复制与移植、专业与业余表演等多种文化形式，并牵涉了民族政策、国际政治（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政治神学、集体记忆等多个话题。集体记忆的形成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是连接着历史与当下的珠串。

在西学传统中，自马克思以降，“历史幽灵学”便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众多研究者前赴后继，投身其中。人们不仅希望厘清“历史”将假以何种手段、通过何种中介（人、政权结构、社会思潮）在当代借尸还魂，还希望进一步了解“历史”对我们当下日常生活的点滴影响与持续渗透。因此，书中的几篇论文不约而同地探讨了“红歌”、样板戏对文革后集体记忆与社会心理的塑造，副标题中的“文化延续性”一词便由此而来。

文革文化的延续

¹此书的英文书名是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从历史分期上来讲，文革研究中存在着“两年文革”、“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之争。不论是以造反派的兴衰还是以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为标准，近年来文革研究的一条主线即是超越由《决议》划定的“十年文革”的官方叙事。可以说，对《决议》的挑战与超越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学分析，而康浩等人近年来则努力将文化大革命还原为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当然，毛发动文革的本意绝非仅仅是清洗文艺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再抛出几个革命样板戏那么简单，但1966年来势汹汹的文革的确始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可以从毛1963年以“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批评戏改，甚至50年代批《武训传》中看出端倪。

换言之，康浩等人执着于从“文化”切入文革，而文化史的叙事实际上暗合了十年文革的官方分期——样板戏的推广与普及发端于七十年代，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如果我们不拘于文革的分期问题，也不拘于这场革命的政治修辞是否名实相符，那么，书中多篇以样板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实际上拼贴出了一部七十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史。

笔者认为，从文革研究的角度来说，全书仅提供了文革历史的一个文化切片，副标题中的“文化延续性”才是真正的点睛之笔。本书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串联从中共建政前、十七年、再到文革十年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潮与文艺实践，以及从社会主义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过渡上。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年来关于文革文化的研究有志于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文教宣传“洗脑”、“泯灭人性”的“刻板印象”，旨在更细致地研究“文化”介入人们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复杂机制。这一学术旨趣主要源于西方学术界对冷战研究中“极权模式”的学术反思、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但由于国内的文革研究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下状态，主流学术界对“党文化”下的愚民式文教宣传缺乏反思，对极权体制的批判更不彻底，这就导致了国内、国外研究的语境错置。在这种情况下，以文革文化为媒介，中西之间是否有进一步对话的可能？

本书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

文革结束了多年之后，当熟悉的歌声响起、样板戏的影像再度浮现，许多亲历者仍条件反射般地产生了身体反应。文革文化对身体与听觉记忆的训练为何历久弥新？它又如何影响着当代的大众文化？文革结束了，但它又幽灵般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现身于当代的政治文化，同时在日常生活的幽微之处面露狰狞。一些当代文艺作品中，文革被浪漫化地加工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红八月”中的武斗也成了传奇般的“血色浪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革真的结束了吗？从反思文革的角度来看，研究文革文化的意义不仅限于挖掘革命样板戏的“成功”之处，文革文化的延续性以及集体记忆对社会深层心理结构、乃至人格和国格的影响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对书中的相关观点展开讨论。

西方学者眼中的样板戏

全书第一篇署名为戴嘉枋（Dai Jiafang）的论文历时性地考察了京剧样板戏的范式变化¹：从带有地方戏色彩、倚重曲调音韵的传统戏剧，京剧样板戏在不断地创作、修改和再创作中，逐渐转变为倚重内容（“革命”）、人物（“三突出”）的革命文化载体，并在音乐创作中对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改造。样板戏中不仅融入了西方交响乐的乐器合奏，营造出了恢弘的史诗风格，还借鉴了西方歌剧中的音乐叙事技巧，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对中国民乐和传统戏曲进行了改良。传统戏曲舞台以演员为中心，以演员的唱腔、肢体动作和表情眼神推动戏剧发展，音乐仅起到烘托氛围、辅助演员表演的次要作用。随着西方的歌剧、交响乐元素被引入创作，样板戏中的音乐语言愈加丰富，乐器演奏成为了台本中除演员表演以外的第二套叙事系统，音乐在推动剧情发展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除第一篇论文以外，黄泉锋（Chuen-Fung Wong）和罗恩·皮斯（Rowan Pease）的论文分别讨论了维吾尔语《红灯记》与朝鲜族《龙江颂》的改造过程。两篇论文都聚焦了革

¹ 戴嘉枋（Dai Jiafang）此文的英译者是 Lau Sze Wing。

命样板戏在民族化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民族政策、中朝关系以及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等等。约翰·文圣博（John Winzenburg）则考查了民国时期在上海上映、由俄裔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音乐剧《孟姜女》。《孟姜女》被誉为中国的第一部现代音乐剧，约翰·文圣博认为革命样板戏中的现代音乐实验在《孟姜女》中就可看出端倪。换言之，中国现代音乐剧的创作始于《孟姜女》，样板戏延续了这一文艺现代化工程，并成就了中国现代音乐剧创作的高潮。

本书中包括黄泉锋、约翰·文圣博在内的作者都将样板戏视为中国音乐现代化、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约翰·文圣博更将样板戏称为“杂糅性的音乐种类”——不仅中西合璧，而且进一步融合了民族音乐和地方戏曲的元素。因此，样板戏不仅仅是传统戏曲西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式戏曲的自我进化。在不断改良之后，样板戏中的民乐种类越来越丰富，乐器编排也越来越复杂。全书几篇关于样板戏论文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节奏”在音乐叙事中的作用。传统戏曲中，锣、鼓、铙、钹等打击乐器主要为舞台表演烘托氛围，样板戏中，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的打击乐器控制、规约着叙事节奏，《智取威虎山》中仅中式打击乐器就采取了大钹、吊钹、高音大锣、中音大锣、低音大锣、小锣、大筛锣等15种。节奏控制使得舞台表演更加正规、有迹可循并且更适宜模仿、学习，这也为革命样板戏的群众性普及与推广奠定了基础。

劳伦斯·科德雷（Laurence Coderre）的论文则关注了业余演员学习和表演样板戏。科德雷认为，样板戏的普及运动之所以推崇业余表演，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工农兵演员并非专业演员，业余身份推动着他们不断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并在一次次彩排、表演中不断进步。因此，业余演员既是群众的好学生，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业余表演中不断进取、不断学习的精神符合毛主义“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其次，业余演员缺乏专业的戏剧表演知识、缺乏理论训练，他们唯有在实践中，一次次完善自己的动作和肢体语言，并借助身体语言加深对戏剧内涵的理解。除了思想改造，对身体的改造与训练也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号召消灭三大差别，业余表演正体现了“脑体合

一”的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视实践改造的路径。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看，科德雷的研究展现了业余表演中“道成肉身”的过程。革命既改造思想，也改造身体，科德雷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身体记忆能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情感结构与思想认识，这也是样板戏普及运动的成功之处。

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对工农兵业余表演的推崇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详细阐述了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业余与专业等重要议题。那么，文革中的业余表演相较于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有何变化或发展？不讨论毛泽东的“业余”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是不是等于说“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萌芽，并一直延续到了文革时期？笔者认为，“文化延续性”应该作为科德雷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出现，而不该在研究中成为既定事实或研究背景，这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比较与分析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康浩所著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是一本以文革中的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专著，书中考查了样板戏、革命芭蕾舞剧、前期的红卫兵歌曲、语录歌，中后期的器乐曲、中小型舞蹈作品，《战地新歌》中的歌曲、话剧、曲艺、电影、官方审定出版的小说诗歌、民间流传的手抄本、知青地下文学、美术、建筑等文艺形式。《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也由康浩主编，本书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他对文革文化的关注，而书中一大半的论文都关注了革命样板戏。那么，这些样板戏研究有何新意？

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历史》中的样板戏研究，主要关注了官方样板戏的文化生产机制；《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中的样板戏研究则不仅关注官方样板戏的创作、改良与艺术风格流变，按照中共官方的用语《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中的样板戏研究实际展现了样板戏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

过程。“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是延安时期制定，并对建国前十七年的文艺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政策。在本书的叙事中，样板戏的创作、推广和普及不仅是延安以来毛泽东领导下之文化革命的延续，更是社会主义文艺难以逾越的高峰，从延安时期到毛时代的落幕，毛主义的文艺思想延续了下来，文革时期则是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这些样板戏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革命样板戏的了解和认识，在内容和细节上是成功的，但其中的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样板戏研究解构了文革文化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解释了样板戏中如何植入了“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但这些研究实际上回避了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深层分析，也没有回答政治与文艺的畸形关系如何使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走向没落。如果毛时代没有结束，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能继续统治人们的心灵、肢体和耳朵吗？样板戏等文革文艺实践改造了人们的身体记忆，但它们真能提高人们的政治热情或改造人们的政治立场吗？大规模的群众性文艺实践中有多少娱乐成分、又有多少政治成分呢？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有些人学习样板戏、学跳忠字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有些人出于自保而从众，有些人则借机自娱自乐。从群众参与的角度看，革命样板戏有那么成功吗？

科德雷的论文简要谈及了一些问题：文革中的小学生喜欢拿腔作势地模仿《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杨子荣假扮土匪、深入敌营的桥段更受群众喜爱；一些观众甚至迷上了样板戏中的反派角色。但科德雷的论文更多关注了官方样板戏如何通过演员表演、剧本改良避开“反派魅力”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雷区，仍旧缺少自下而上的群众视角，也没有对群众参与文艺实践的动机和心理做进一步的讨论。目前众多的样板戏研究多是围绕官方样板戏的文化生产机制展开，从一定程度来说，类似的研究都难逃窠臼，只是对文艺实践的洗脑机制做出了更加精致、复杂的政治美学分析。笔者认为，从文革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分析样板戏普及运动等群众性文艺实践背后的社会心理。

蔡灿煌的古琴研究：从大众走向精英

相较之下，论文集中的一些非样板戏研究更能体现文革文化的本质。蔡灿煌（Tsan-Huang Tsai）在研究古琴演奏的历史后发现，建国前十七年是古琴从精英、小众乐器走向人民大众的黄金时期。文革虽然从表面上批判官僚特权、砸碎官僚机器，但实际上从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国务院文化组及其下属的改革小组、录音录像小组就开始将各地优秀的古琴演奏家们统一收归领导¹。

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和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中国重回世界外交舞台，并开始与多个国家展开文化交流。根据国际惯例，中方提供的交流项目应该能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涉及到音乐领域，则应该是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但由于文革的“破四旧”运动“横扫”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受到了严重摧残。因此，尼克松访华之后，国务院文化组的首要任务就是组建中国艺术团等文艺表演单位，并通过下属的改革小组抢救传统音乐。改革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改造包括箏、瑟、琴在内的传统中国弦乐，由于相关领导人意识到在“音乐历史长河”制作中，古琴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因此，文革爆发后长期无法抚琴的古琴演奏家李祥霆、龚一等人，从1973年开始重拾琴谱。

龚一等古琴演奏名家从此只能为外宾表演、为毛的个人喜好录制唱片，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为适应登台表演的需要，改革小组对古琴的曲谱和琴身都做出了改造，力求演奏时音量更大、曲调更能传达“革命精神”。蔡灿煌敏锐地观察到，文革时期古琴演奏的现代化改造没有超越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并且七十年代的古琴改造在文革后期皆被废弃——历史走了一段弯路，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此外，文革以批判和砸烂官僚制度拉开大幕，但蔡灿煌的研究表明，在早期的革命动员结束、各地造反派被压制、清算之后，七十年代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去动员化”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旧的文化机构恢复运作，一些新的文化机构被建立了起来，新的官僚体

¹ 对于这段历史，还可参阅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的文章《论“文革”后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原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61-167页。

制逐渐生成。受史料所限，蔡的研究尚无法清晰勾勒国务院文化组等文化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江青、叶剑英、于会泳等人对改革小组的影响和领导身份都不很明晰，接受蔡灿煌采访的一些古琴演奏家在七十年代实际上被秘密控制起来，他们既不能问，也不能说，政治高压下许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错乱、叙述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改革小组和录音录像小组是一个“黑匣子”般的隐秘官僚机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们成立的目的一是为了应付对外文化交流任务，二是为文革后期“皇帝”的内廷提供服务。

王斑对文革电影的另类解读

除了古琴研究，论文集还收录了斯坦福大学教授王斑（Ban Wang）的《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中国文革中的电影与歌剧》（*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ism: Films and Opera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这篇文章将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电影、戏剧和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光谱置于国际大环境中加以考察¹。王斑认为，文革的爆发蕴含了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与校正（“反修防修”、“反帝防修”）：《春苗》、《决裂》、《年轻的一代》等关注教育革命、农村医疗的文革电影体现了中国道路对特权阶级的批判、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七十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现了中国在美苏夹击与国际封锁中的艰难突围与上下求索。电影是联结第三世界人民情感的纽带，也是将国内、国际形势进行同构化勾连的意识形态载体。《海港》通过刻画码头工人保护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体现了劳动者的国际主义情感。

与此同时，中国还引进并译制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以朝鲜影片《苹果收获的季节》为例，王斑分析了影片所展现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图景。王斑认为，不同于苏联工业化建设中的技术官僚治国和国家资本主义主导，《苹果收获的季节》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前提下，以社会平等为目标进行社会主义建

¹ Ban Wang,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ism: Films and Opera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aul Clark, Laikwan Pang, and Tsan-Huang Tsai (eds),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85-106.

设。在王斑看来，七十年代的戛然而止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干扰了七十年代开始的这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近二十年来，中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并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开发“崛起”为亚洲新的超级大国，这种径路背离了七十年代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想，也背离了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初衷。

新左派与多元化

如果说《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一书中的样板戏研究更多关注了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延续性，那么王斑的论文则讨论了七十年代至今文化—政治的断裂与延续。王斑借用了汪晖、霍布斯鲍姆、哈特与奈格里等国内外“新左派”学者的分析，通过讨论冷战格局下地缘政治所引发的文化—政治危机，将七十年代“三个世界”中的学生抗议、社会运动与文化革命并置在一起进行对比与分析。

王斑首先引用了汪晖的观点，分析了国家的官僚行政体系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党/国的行政与军事控制合流，挤压了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和讨论。社会团体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反官僚主义行动不得不让位于自上而下的派系政治、行政紧缩与军事管制。汪晖将这一变化称为“去政治化的政治”，并指出中国文革的爆发是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政党的“去政治化”所致。霍布斯鲍姆也认为，六、七十年代三个世界的社运、学潮和反战抗议具有同样的政治根源和普遍联系。

王斑的独创性在于他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七十年代社会思潮与西方学运的不同之处。王斑指出，以1968学潮为代表的西方学运并没有突破国家合法性的框架，只是一场反文化的文化运动，比如，在西方学潮中，毛泽东被青年们视为摇滚巨星般的流行偶像，而中国文革中的青年思潮实际上突破了国家合法性叙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旨在对生产关系做出政治经济分析，这套阶级话语在建国后被裁剪，并退化成了以家庭成分论出身的僵化话语。在文革中，“阶级”不再由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和压迫所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文

化和政治资本分配不均使文革中的青年异端思潮将矛头指向了官僚特权阶级和整个的党国体制，对党-国体制的挑战与否定也是文革中的青年异端思潮被迅速扑灭的原因。

如果我们沿着王斑的思路走下去，继续对比中西方社会思潮的异同，就会发现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与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大众文化层面的相似性。王斑在文中也提到，当代文化将文革改写成为一场在力比多支配下、由一群追求自由的青年所发起的激进运动，青年造反则被改写为一场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¹般的政治表演。在姜文的电影中，毛泽东被塑造为最伟大的摇滚巨星，摇滚歌手崔健则成为了文革遗产的最佳继承人。在文化修辞的转换下，文革中青年造反派的政治讨论对中国未来的严肃追问被渐渐遗忘；与西方学潮类似，当代文化中的文革被改写成了一场真正的（反文化）“文化”运动，与“政治”不再相关。

当我们追溯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时，会发现七十年代成为了一系列转变的起点。由于七十年代对青年异端思潮的压制，严肃的政治讨论逐渐转入地下，由政治参与转为文化参与是七十年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一——文化启蒙取代了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内部的理论与文化自新或被扼杀、或走向失败，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重新恢复了“五四”传统，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并逐渐从社会主义内部的话语、理论转为调用外部话语、理论以解决中国问题。北大教授李零在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中写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在这个层面上，王斑等人的论文帮助我们更多元、立体地认识了七十年代，这也为本书增加了可读性。■

¹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又译作“胡士托音乐节”，在美国纽约州北部城镇伍德斯托克附近举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系列性摇滚音乐节之一。该音乐节最早举行于1969年，又分别于1994年，1999年举行了第二、三届，主题是“和平、反战、博爱、平等”，规模与阵容史无前例，也是历来少见铜臭味儿的一次音乐节，标榜“音乐与艺术的结合”。（见百度百科）

【评论】

《桥》：自力更生与民族主义

启之

在毛泽东时代的电影史上，《桥》占了四个第一：第一部长篇剧情片，第一部“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的电影，第一部以工人为主人公，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影片。这一母题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六七十年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它讲的故事——

1947年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因松花江上的江桥被炸毁，南北交通受阻，运输中断。前线司令部要求铁路总局在大江解冻之前、半个月内修复大桥。铁路工厂面临着三大困难，第一，化钢的电炉坏了，没有修电炉所需的白云石。第二，修桥需要三十多吨钢材，上级无法解决。第三，桥座上要打五万个铆钉，靠厂里只有几台钻床干不完。思想保守的总工程师认为完成任务至少要四个月。厂长依靠党员，发动工人克服困难。抱病工作的化钢炉组长党员梁日升，建议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遭到总工程师的奚落。但厂长对这一建议积极支持。没想到，修炉的时候，落后工人席卜祥偷懒，以化铁砖代替耐火砖，造成化钢炉“跑火”。进步工人吴一竹找出了问题，梁日升重修化钢炉，第二次试验获得成功。与此同时，铆工组老工人老侯头发明了用风钻代替钻床的技术，提前完成了为五万个铆钉钻孔的任务，工人们又从废料堆里拣出了修大桥需要的钢材。

厂长带领工人来到修桥工地，工程开始不久，江水融化，工人们争分夺秒，关键时刻鼓风机又出了故障，工程停了下来。受到工人阶级教育的总工赶到现场，排除了故障，风

钻再一次响起……。

江水冲垮了架桥的木垛，然而，钢架已经牢牢地耸立在松花江上。红旗招展，第一辆火车披红挂彩徐徐开来，老侯头向厂长说了心里话——申请加入咱们的党。厂长紧握他的手，答应做他的介绍人。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满载战士、弹药和给养的火车轰轰驶过江桥。

当年“周恩来看过影片后，热情地同导演王滨和主要演员王家乙、陈强等一一握手，兴奋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¹从国统区来的名导演，后来当了电影局局长的蔡楚生，看了这部片子后写了一篇《颂“桥”》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表达：

“《桥》是我在踏进了解放区——北平，所看到的第一个艺术制作，尽管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其它的作品，但仅只这制作已经足够使长久地窒息于反动政权的钳制迫害之下的我们为之一欢欣鼓舞了！”“《桥》的主题是如此之鲜明，题材是如此之现实，感情是如此之健康，贯串全剧和洋溢在全剧中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类爱——一种工人阶级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献身的伟大的精神。”²

这里的人物、故事、主题以及题材类型在另一个阵营的银幕上是看不到的。换一句话说，这种社会主义阵营独有的影片，是独有的理念的创造出来的。它可能具有“在平易中见真实，于朴素中显亲切的特点。力求以近于白描的方法刻画人物，表现生活。”³

二

后毛时代的电影史学者发现了这部影片有两个缺点：

一、“影片忠实于现实生活的记述和报道，但对生活和人物缺乏更集中的典型化概括；

¹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第76页，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² 蔡楚生：《颂“桥”》，载《电影文学》1959年第二期。原注：“本文是作者在194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时看了《桥》的映出后写的。先发表在文代会筹备会的《文艺报》第六期，其后许多报纸都曾刊登过。”

³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第77页。

过多地描写了劳动过程，而对工人心理活动和感情世界的揭示却显得不够。”

二、“政治意念痕迹较重，对于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的丰富性表现得过于简单化。如对总工程师的处理就比较概念，他的转变也缺少根据。”¹

其实，这是毛时代所有的工业题材共同存在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既然“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就只能是图解政治的符号。所有的塑造呀，描写呀，都不过是给这些符号加上了某种固定的标签——党员一定是起带头作用的，一定是抱病坚持工作的，一定是善于团结落后分子的，一定是敢想敢干的。厂长一定是与工人同甘共苦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永远和蔼可亲。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保守的，对工人的力量和聪明才智总是要怀疑的，而事实一定会把他们教育过来，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检讨，跟上革命队伍。

要给工人阶级这个符号贴标签，需要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首先要把他们分成先进与落后两个等级，然后，在先进之中又要分出两档，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是党依靠的对象，他要担负起两个任务，一是在适当的时候用忆苦思甜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二是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并且在任务完成之后提出入党的请求。年轻的工人一定工作热情很高，但是没有经验，火爆急躁。最后，是给那些落后工人贴标签：他们一定工作消极，爱发牢骚，一定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因此，情节的转折、意外事件的发生一定要由这个人来完成。当然，在影片的结尾，他一定会摘掉落后的帽子。

标签就是概念，无论梁日升、老侯头走到哪里，都会有这样的声音跟着他们：“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真正的聪明才智”；不管总工程师做什么，他的脑门上似乎都贴着这样的说明：“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团结和利用的对象”。而厂长的言谈举止则处处表明“在党的领导下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人物的概念化，生活的浅表化与母题的狭窄有关。试想，如果表现革命与斗争、新旧对比和歌德与效忠一类情节在作品里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么，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会好到哪里去？

¹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第78页。

三

《桥》的最大贡献是为工业题材确立了基本范式——打破了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建立起新的艺术准则，即用宣传性替代戏剧性，用阶级性来塑造人物，将主题政策化、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这种新范式很快成为毛时代文艺实验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大多数工业片所效仿。《桥》之后，从1949年到1955年的六年间，三大国营厂生产了8部工业片，依时间顺序是，《光芒万丈》、《高歌猛进》、《女司机》、《走向新中国》、《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英雄司机》、《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影片中只有《走向新中国》和《在前进的道路上》与《桥》略异其曲¹，其它六部与《桥》如出一辙。

于是，我们看到，同样的主题出现在这六部影片之中——在迎接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中，或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里，工人阶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这样的主题制造出大同小异的故事：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或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某先进工人大搞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努力学习文化技术。他/她或是修复被国民党特务毁坏的电机（《光芒万丈》）；或是改造刀具创造车丝拱的新记录（《高歌猛进》）；或是钻研开车技术，排除了翻车险情；（《女司机》），或是改造钢炉，增加炼产量；（《伟大的起点》），或是改进轧钢设备，免除劳动强度；（《无穷的潜力》）或是将货车多挂车皮“超轴”拉货的实验成功（《英雄司机》）。落后的工人在奚落他/她，技术干部在打击他/她，但是，在党的支持下，他/她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了群众的帮助，战胜保守势力，终于取得成功。

四

如果说《白毛女》是新旧对比的极品，《南征北战》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那么，《桥》就是自力更生在银幕上的前驱先导。从五十年代的工业片，到七十年代的学大寨学大庆，

¹ 《走向新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在前进的道路上》原名《荣誉属于谁》以铁路局副局长为主角。前者写的是一个爱国工程师与工友从积怨到理解的故事；既肯定了这位工程师的爱国思想，又批评了他在技术创新上的保守观念。后者写的是副局长如何改进列车调度法，赞扬了他的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的精神，批评了铁路局局长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

这种精神贯穿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之中。

自力更生包含着自信、自强、自立和自尊。对于有着辉煌历史，百余年来却积弱积贫，受气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语言，比自力更生很投合他们的心思了。对于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而又遭受西方经济封锁的中共政权来说，自力更生又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毛泽东在抗战时提出的“自力更生”，在1949年之后，迅速地应用到了国家的重建上。

《桥》通过歌颂工人的创造精神和冲天干劲，将自力更生这一具有大陆独有的精神气派彰显于世，使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有所遵循。摒弃洋教条，旧框框，强调独立自主，成为工业题材上的基本内容¹。战天斗地，抗灾抢险，强调艰苦奋斗，成为农业题材的基本取向。² 作为毛时代电影的一大母题，自力更生体现了爱国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成为整个时代励志的座右铭。

但是，在歌颂工人的同时，《桥》贬低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影片中的总工程师怀疑工人的能力和干劲，把科技和洋书本视为修桥的根本，否定了老工人用土法修炉的大胆创造。结果，总工程师认为四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工人们半个月就完成了。总工程师认为“瞎胡闹”的发明（耐火砖代替白云石），在工人手里成功了。这种叙事结构告诉人们：新中国的建设，靠的是工人的干劲，而不是科技人员和书本知识。科技人员是保守的，书本知识是僵化的。³ 由此一来，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特有的科技知识，就成了自力更生的对立物，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也蒙上了阴影。

千里之行，始于《桥》下。在主流思想的鼓励下，《桥》的上述倾向在后来的影片中

¹ 五十年代的《高歌猛进》（1950），《劳动花开》（1952），《无穷的潜力》（1954年），《试航》（1959），六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春暖花开》（1960），《激流》（1960），《青年鲁班》（1964），《浪涛滚滚》（1965）等影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² 五十年代的《农家乐》（1950），《丰收》（1953），《水乡的春天》（1955），《春天来了》（1956），《牧人之子》（1957），《江山多娇》（1959），《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六十年代的《抗旱曲》（1960），《鸡毛飞上天》（1961），《春催桃李》（1961），《北国江南》（1963），《汾水长流》（1963），《龙马精神》（1965）等影片可为代表。这一母题在励志性的影片《老兵新传》（1959），《北大荒人》（1961），《昆仑山上一棵草》（1962），《生命的火花》（1963）等戍边垦荒的故事中表现得更突出。

³ 编剧于敏四十年后在《过来人说〈桥〉》一文中说：“集中于一点，即未能充分表现技术人员的作用，这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我心悦诚服，又稍有保留。那时大战方酣，胜负未决，东北的大部分尚在蒋帮手中。有些老工程师多有变天思想，不大敢出头露面。工人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出于阶级觉悟，也是时势使然。”见1999年8月21日《文艺报》。也就是说，总工这一形象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生活根据，但是编剧塑造这一人物主要根据的还是执政党“改造、利用、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

做大做强。自力更生后面的民族主义也随之膨胀，强调独立自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展为妄自尊大。强调不受别人控制，反对奴颜婢膝，发展为盲目排外。强调艰苦奋斗，发展为拼命硬干的唯意志论。轻视科学知识，发展为读书无用；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就成了崇洋媚外。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就是“洋奴哲学”。■

【书 摘】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

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国际形势

讨论共和国前期的外交，不能不先谈一下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因为所谓外交，顾名思义，也就是对外关系和国际往来。国际形势对外交的影响并不亚于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所以要谈一个时期的外交，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然而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形势千头万绪，这里不可能作系统阐述，更不会面面俱到。我只想就几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谈点个人意见，并不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形势只有这几个问题，也不表明哪个重要或哪个次要。作此说明后，就让我们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全球化与中国；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和社会潮流；美苏冷战与中国。

第一节 我们所处的时代¹

——共和国诞生在两个时代的交接期

¹ 关于时代问题，二十多年前我曾将几次报告整理成一篇文章，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为题发表。后来又和其他有关文章合并成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印出。离休后由于改行学党史，有些观点如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看法，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对时代问题的理解并没有改变，后来又作进一步发挥，见《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文，载于《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70页。

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分为前后各三十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却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存在沉痛教训的三十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虽然缺少政治改革，但还是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三十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坚持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继续以世界革命为总路线和总政策；后者认定时代特征已转变成和平与发展，总路线也改为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并维护世界和平。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证明了对时代的认识和判断的重要。事实上，共和国成立时，正好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结束及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开始。这就是共和国成立前后面临的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

一，二十世纪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对时代的理解和划分

我们这里谈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传统提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被置于首位的一个重要概念。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都是从对时代的判断出发，中国也不例外。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制定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战略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不管是不是用时代这个名词。所以，我在这里还是采取老办法，从我们所处时代谈起。

那么，什么是时代呢？简单说来，时代就是指对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的判断。

时代特征的转换交替，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客观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对时代特征做出正确判断和适应，而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它们。但是有不少学者在谈到时代和时代的特征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时代和时代特征是由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而把战争与革命时代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交接定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因为在这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都肯定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才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随后由党中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实际上，不论叫时代特征还是叫国际形势发展总趋势，都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重要大国领导人决定的中心任务，也只能对它产生某些影响，绝不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替代旧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由此观察时代，可以看到和认定：第一，它是国际性的，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例如中国有毛泽东时代，就只适用于本国。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阶段，如信息时代。第三，它具有决定性。世界上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趋向和事态经常都在发生和存在，包括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转和改变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只能受它的制约。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时代和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不会轻易改变。因此，对时代的判断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的根本性判断，不能碰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以至改变对时代的认识，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这次时代的交替，也就是旧时代的基本特征已失去作用，而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所取代。这个转化过程，准确地说，可以定在二战结束到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顶峰已过的1950年代初。因此，过去的二十世纪就分为各占一半的两个时代。前期被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因为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引起了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爆发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就已正式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这时不但大战已经停止，而且交战国也多已先后医好战争创伤。同时战争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衰落。这期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时代特征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漫长时期。

战争与革命时代，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所肯定，从来没有什么争议。例如毛泽东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延安时期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奠基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历史的发展虽然证明，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前景的估计属于主观臆断，但他当时接受列宁、斯大林对时代的判断却并没有错。这是因为，把二十世纪上半期称作战争与革命时代是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什么说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提法基本上合乎那个时期的历史实际呢？

第一，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接连发生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战火延续6年，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位参战，波及20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战地面积广达2200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多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民超过5500万，造成的物质损失估计达时价14万亿美元。这里还没算战争带来的其他后果和战前备战与战后恢复的影响。拿我们中国来说，单是八年抗战中遭受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军民就有2100万，给我国造成的物质损失在6000亿美元（按1937年的价格）。而且日本的军事侵略和中国的局部抗战，早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已开始。除抗日战争外，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还一直处于各种不同性质的内战状态中。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一直处在典型的战争与革命时代。

第二，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一度较快发展的国际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比起二战来规模和破坏都小一些：参战国家33个，卷入人口13亿、造成死伤各2000万。但它破坏了世界经济，促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使世界经济倒退到二十世纪初的水平。以国际化来说，世界贸易在1889到1913年差不多翻了一番，但1913-1938年世贸出口的年均增长却只有0.7%，更不能和二战后1950-1973年的年均增长9.1%相比。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二十世纪前期已基本陷于停滞。1938年只有263亿美元，到1950年才增长到544亿美元。总之，二十世

纪前期的世界，是处在冲突和战事丛生，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¹

第三，两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两次世界性的革命高潮，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导致许多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和调整，这就使二十世纪上半期称得上是一个革命和大变革的时代。一战结束，正如恩格斯预言的，曾造成大批皇冠落地，特别是俄、德、奥匈和奥斯曼四大帝国垮台，欧洲许多中小国家获得独立。亚非等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都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虽然多数遭到失败。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摆脱1930年代的大萧条，实行“新政”改革，其他一些国家也起而仿效，被一些人称为“凯恩斯革命”，使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改良进入一个新阶段。二次大战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更具划时代的性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一百多个国家获得独立，民主化运动也改变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客观历史根据。

先谈和平。二十世纪下半期，世界大战早已结束，而且战后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和国际局部战争也都停止。中国解放战争，双方投入兵力1300余万，战火遍及全国。此后世界上就再没有规模超过这次的战争了。以国际战争来说，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恐怕是二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参战国家，“联合国军”方面为16个，另一方为毛泽东说的“三驾马车”——中、朝、苏联。双方参战兵力近300万，死伤也各在100万以上。越南战争只是时间更长。其他局部战争规模都在朝战之下。而且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从来都是指的世界大战，上述的国内战争和局部战争还不算数。邓小平就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

¹ 这里所引经济数据，散见于李琰著和主编的《李琰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丹·耶金、约·斯坦尼斯罗著，段宏等译《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等书，不一加注。

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¹ 二十世纪下半期，虽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一直进行扩军备战，使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状态，但终究没有挑起大战，而且国际形势还越往后越趋向缓和，直到冷战结束。因此，从二战的停止到1950年代初战争善后工作的基本完成，整个说来，世界就已进入了和平时期，人类也从此过上了长期的和平生活。据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最近收集的数据显示：我们眼下处于1950年代以来全球暴力的最低点。² 哈佛大学专家史蒂文·平克更认为，我们或许生活在有人类以来最和平的时期。人们觉得处于恐怖中是由于，暴力虽然逐渐减少，但信息却不断激增。过去二十年的信息革命，使一次爆炸也可成为突发新闻。

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今后长时期能够维持和平、避免大战，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类，特别是世界大国人民的觉悟和进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觉醒变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对大国来说，人也不单指人民群众，连领导人和统治集团都再没有打世界大战的主观意愿。在冷战时期，被邓小平说成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一直避免迎头相撞。二是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缓和以至解决各国自己以及相互间的一些矛盾，而无须诉诸战争。这说明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三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得到不断改进并渐趋合理，使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强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争夺地盘和市场而互相厮杀。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更新，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都成了制止大国之间战争的手段。所有这些，就使人类已经过了七十年的和平生活，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爆发世界大战。

¹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4页。

² 《参考消息》，2008年5月5日。

再说发展。也是1950年代，前一时代特征的革命已为后一时代特征的发展所取代，只是这个转变的时间长一些，不像战争转化为和平那样快捷和明显。而且革命和发展也不容易分得太清，因为广义地说，革命本身就属于社会发展。不过作为时代特征，两者的含义还是完全不同的。革命总是指民族独立、政权更迭和制度改变，方式多用暴力。发展则只指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社会、文化的进步。由于二战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属于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所以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和被压迫民族取得国家独立。而这些，可以认为在1950年代初期就已经基本实现。因为占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口五分之四以上，包括主要国家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以及许多西亚北非国家，都已在1950年前获得独立。出于形势所迫，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不得不先后承认它们所属非洲国家的独立。例如法国在1960年的半年内就放弃了对12个非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可见，1950年代后的殖民主义已属强弩之末，在国际事务中已不再起重大作用。因此，把时代特征从革命向发展的转化，定到1950年代，应看作是不争的事实。而据2008年2月16日《经济观察报》载陈志武教授访谈，其中引证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左右到188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增加一倍（从500美元到1100美元），从1889年到2000年，却增加五倍。还有两个带标志性的事情值得一提，就是1950年代中期万隆会议的召开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兴起。连第三世界这个名词也是1952年才由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费雷德·索维尔提出来的。他在一篇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文章中给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群体取了一个名字，叫第三世界，后来也就在全世界传开了。所以李琰在《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中也明确指出，“第三世界是1950年代初形成的”。

发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由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来和平与发展两个特征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维护。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是人们都体会到了的。第三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二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

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直到1980年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开，卷进的人口从这以前的6亿增加到二十世纪末的60亿，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第四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二战后又一大世界潮流，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的歧视和限制。战后，从七十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扩展。还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进步。例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四十多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中所提要求，现在就已基本实现。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明证。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它们既是维护和平的支柱，又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无须多说的。

二战后，在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下，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人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创造的生产力和积累的知识财富，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成就的总和。以经济来说，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三十年，世界工业产值累计额就是此前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两倍。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他们以往二百多年生产产品的总和。一般估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80%到9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所以科技的飞跃更为人们所称道。但是，谈论发展还不能只注意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革新，而忽略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改良和进展。

根据以上论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应当是无可争议的。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从这些因素的性质和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二，毛泽东在时代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对时代误判是国际共运的普遍现象

以斯大林为总指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视二战后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仍然坚持列宁主义的老教条，断定世界依旧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对时代的判断是认识国内外形势的出发点和确定路线政策的基础，因此，各国共产党根据这一错误判断制定的路线政策，也只能是错误的。这也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至整个国际共运，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战后不久，铁托曾在公开讲演中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责备它们不应放弃武装，同资产阶级妥协，而应以武装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称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对此，法共多列士和意共陶里亚蒂都进行过答辩和批驳。其实事后看来，批评者并没有认清时代。因为无论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力量对比，都不允许欧洲各国共产党再打内战、夺取政权。不但美英绝对不会让法意变成苏联卫星国，就是这两国人民也不愿在消灭法西斯后再来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希腊，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等国的直接指挥和援助，希共恐怕连武装和根据地都很难建立起来，哪里还谈得上夺取全国政权。即使没有英苏间的“百分比”协议和英国斯科比将军的干涉，希共的武装斗争也是会最后失败的。而且不能拿法、意和希腊的情况和中国比。中共拥有久经锻炼的百万武装，又早作了夺权的准备，而且国土辽阔，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还背靠苏联，得到它的大力援助。而对手则是早已失掉人心的腐败政权，美国也不敢给予直接援助，所以经过三四年的武装斗争，就取得全国胜利。这些问题，下面还会细谈。总之，法意两党（它们都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力量的逐渐衰弱，大概不是有些人说的，由于执行了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所谓“联合政府”策略。恰巧相反，倒是它们实行了过左政策，逐渐脱离了昔日追随它们反法西斯的群众，把机遇让给了社会党。

（二）毛泽东对时代的看法越来越“左”

从延安整风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大力鼓吹个人崇拜之后，毛泽东很快就开始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各地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大多写成“主席并中央”。所以毛泽东的看法，也就是党中央和中国党的看法。而毛泽东的看法，不但完全接受列宁斯大林的判断，还比他们更“左”。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完全落空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越来越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毫无根据地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

1950年代初期，毛泽东倒还能听从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取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他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毛泽东在1957年签字的《莫斯科宣言》，不但正式肯定了这一论断，而且还指出“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是多样化的”同时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¹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挑起的反修斗争日趋尖锐，对时代的提法也越来越调子越高，不但回到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老提法，而且还一再加码，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¹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这种时代判断下的形势估计，也是越来越盲目乐观。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1960年代初又有“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名言。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用毛泽东内部报告中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奉命叫板：“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¹还接着讲到，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

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人的这种主观因素，自然影响到他们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所以才先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上升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好像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或苏联（甚至认为它们会一齐来，认定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了，神经紧张的不得了。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伟人与中国》一书中叙述他1975年10月访华时同毛泽东的会见，就提到毛曾开门见山地说，“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问及“如何看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回答也是“要打仗。”“他（指毛）简直被这个思想迷住了。”判断既然如此，所以采取的对策就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立即转变到全国动手，全面备战，而且“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这一错误的主观判断，曾使全国在很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已成了日常的口号，连我们在偏远江西农村的外交部“五七干校”也挖起了战壕。现在看来，这些似乎都是很可笑的，但却是当时的实际政治。

¹ 《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

（三）中国的沉痛教训

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时代的交替，仍然坚持已过时的判断，还不断加码，所以据此制定的战略方针就必然与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也是在和抓住机遇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整人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交流、取长补短；我们为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三十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年以上。因为共和国成立时和我们差不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既有大国如日本，也有中小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利用那难得的二三十年机会，很快就变成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竭力追赶，连颇具雄心壮志、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邓小平，都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的错误，弥补起来多么不容易，决不能靠说大话解决。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在下面就再做点简单的国际比较。

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4.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2%；1980年，总量占世界比重降为2.5%，人均降为美国的2.5%。反观日本，1955年总量占世界份额2.4%，约为我国的一半；1980年总量份额上升到9.5%，约为我国的四倍；人均从相当于美国的11%上升到77.9%。¹ 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1953-1978）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² 另据《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载周天勇一文称，“194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倒数第二位，仅是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3。” “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公斤和

¹ 吕书正：《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比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五期。

² 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0.2 斤。”“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 170 位以外。”邓小平也说，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 20 年。（按：我认为，头七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闭关自守，以及“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执行的政策和当前的现实以及自己制定的今后发展方针）这二十年（我看应为三十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¹。

极左路线导致我国在世界经济大发展年代的严重落后和倒退，已无须再列举更多数据了。有些社会指标也多类似。这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和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结果，还不说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说成完全失败，恐怕不算过分。但是我们在宣传上还总脱不了从苏联学来的大量掺水的陋习。例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做的讲演中，还公然说，“从 1952 年到 199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7%，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长 3% 左右的水平。”² 这离实际情况该有多远呀！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却相反，为了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又竭力压低改革开放的起点。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所讲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³（另按国家统计局 2008 年 10 月 27 日报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1978 年占世界比重为 1.8%）上升到 2007 年的 5% 以上。”这些数字恐怕不能只怪写作班子，关键还是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错误不敢清算，真实历史不愿让老百姓知道，人们只能听领导人随便说的了。

三，在时代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一）对时代特征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后果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不管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二战后世界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凡是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国策并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世界潮流的国家或地

¹ 邓小平 1987 年多次谈到，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7、234、254 页。

² 《人民日报》1999 年 10 月 23 日。

³ 《人民日报》2008 年 4 月 13 日。

区，不管是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必然得到迅速发展，以至创造出奇迹。与此相反，凡是仍然坚信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又排斥市场化和民主化潮流的国家，无论叫什么主义都肯定落后。这已是经世界各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规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上世纪后半期，而且还会继续适用于二十一世纪。只要回顾一下世界各国过去五六十年的发展情况，就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经过二次大战，凡属战场所在国家，经济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可说已成一片废墟。德国的领土被割去四分之一，原居民被迫迁走。“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为战前1936年的33%。饥饿成了被占领德国的主要问题，土豆和萝卜代替了经常紧缺的面包。”¹ 战败后的日本也是满目疮痍，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空袭破坏，194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战前的65%，工矿业只有28%。² 当时的德国、日本，人民的处境都极为悲惨，缺吃少穿没房住。但由于西德执行了艾哈德以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日本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很快“奇迹”就出现了。1951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和平时期最高水平的1938年。³ 而日本1946-195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竟达9.2%。而1955-1973年的年均增长率更在10%以上。⁴ 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地位已跃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过英法而稳居第三。

其实，现在看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二战后，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出现了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科技革命，国际化得到迅猛发展，这都为人类迎来了历史上一次空前快速的大发展机遇。凡是掌握时代特征、适应世界潮流，都实现了快速发展。除一些欧亚大国外，许多小国或地区如欧洲的芬兰、挪威、爱尔兰等，亚洲的“四小龙”，也都创造了“奇迹”。只有错误认识时代、违背市场化、国际化的世界潮流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一定吃亏、落后。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莫不如此。

过去一直说苏联由于社会主义优越，发展迅速，因此二战后它的经济总量已仅次于美

¹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译本第341页。

² 冯昭奎：《日本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第37，39页。

³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的崛起》中译本1982年版第154页。

⁴ 冯昭奎：《日本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第37，39页。

国位居世界第二。后来的调查证明极不准确，原来是苏联在公布统计时大量造假（1967年后已不再公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麻痹苏联用的策略所致。1990年7月，在戈尔巴乔夫实践了列宁要求的“公开性”后，七国集团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四个单位，对苏联经济实力进行研究。它们于同年12月提出报告，结论是：1989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约略相当于加拿大水平；人均商品与劳务产出为178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平均17606美元），只稍微超过哥斯达黎加。1990年5月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苏联人均消费水平，1917年占世界第7位，到1990年已退到第77位。¹

至于我国呢，前面引证的数字证明，头三十年的发展还在苏联之下。极左路线导致我国在世界经济大发展年代竟是严重的落后和倒退。把这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说成完全失败，恐怕也不算过分。

（二）中共中央对时代特征的认定

时代交替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人才开始考虑，并且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才逐渐悟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时代特征。

毛泽东去世后，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思想僵化分子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以及靠“左”起家的得利者以外，都已认识到不能再像毛时代那样折腾，必须改弦更张，另寻出路。对于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的认识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但这首先遇到了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仍然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已变为“和平与发展”。由于这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前在国内问题上就和毛泽东有些不同意见，所以在集中搞建设上思想还容易通；但在推行革命外交和搞反修备战等问题上却曾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因而改变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就要困难得多，要费很长时间才能基本上转变

¹ 宋以敏：《苏联巨变和战后世界格局的解体》，载于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过来，而且各人认识的先后和程度也并不一致。所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几年，我们的对外宣传口径还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都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哪还有心思去集中力量搞建设呢？

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上，当时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可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刚进入中央领导的胡耀邦，他最早看出时代特征已变为和平与发展，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再是革命。二是位居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他看到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主张我国也应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却仍然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要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这两种不同观点还在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有过直接交锋。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7月17日在回答使节所提问题时表示不同意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和战争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的提法，要对所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重新认识。邓小平在第二天的讲话中却针锋相对地强调，“战争威胁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¹直到1984年冬，邓小平才基本上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三是党内资格最老的陈云一直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直到1989年还针对学术界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文章，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²

上面所提三位是三种不同认识的代表。在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起决策作用的不是持哪种认识的人多，更不管哪种认识正确，而是看哪种认识的代表人物处于“说了算”的地位。因此在那些年代，邓小平逐渐形成的看法就成了中共的正统理论和制定政策的基础。他观点改变后的提法，是在1985年3月4日对日本客人的谈话，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这就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了党和政府对国际形势根本判断的战略高度。虽然邓本人提法很不

¹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版第396页。

²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彻底，有很大局限，但在他的同意或指导下，经过几次党代会，已最后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虽然还有些不同意见和随形势的变化时而出现反复，但是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却已不可动摇了。

为什么说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的看法有很大局限呢？第一，他的看法多少有点随意性，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和完整的体系。邓小平只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问题提出，而不是作为时代特征提出。1985年说的“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按当时的阐释和理解，在苏联和华约解体的1992年应当说是解决了，而他却在南巡讲话中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如果他原来的提法是指时代特征，那又根本不存在解决不解决问题。请问，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与革命，是否解决了，又是怎样解决的，能说得清吗？这不但说明他本人对时代特征没有完全弄清楚，还给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提供了口实，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使决策层对时代特征缺乏明确认识和坚定态度。例如，据说在1999年发生科索沃事件和美机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曾经讲，“过去对和平与发展讲得太多了，阐述和认识上存在过头现象。”从而引起一阵叫喊备战和鼓吹民族主义的舆论高潮。第二，他对和平与发展的阐释和定性不够准确，不完全合乎历史实际。例如他说，“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并强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正像把和平问题简单归结为东西问题不够准确一样，把发展问题界定为南北问题也是说不通的。因为进入新时代近五十年的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是全世界的发展，主导这一大发展的并不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而是北方（发达国家）。并且这一发展不止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大发展。正是由于邓小平把发展局限于经济领域，所以他倡导和主持的改革开放也只限于经济，把政治改革（即民主化）的要求视为西化（自由化）或和平演变而加以拒绝和禁止，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条件下跛脚走路，并导致权贵阶层和两极社会的形成，使社会稳定和经济改革也很难以为继。第三，邓小平多次对人说他读书很少，他确实也从不以理论见长自况。所以在有关时代的问题上，他的论述不但称不上科学体系，而且始终没碰过时代这个词。据说在学术界争论和

平与发展时代问题时，有人问到他的看法，他只表示：不忙，要继续观察。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和文革后的历次党代会，都没有给我们所处时代做出明确定义，这就意味着党中央对时代一直没有一个正式提法。

虽然邓小平对时代问题语焉不详，中央也没个正式提法，但是中央领导人中和学术界还是提出了各种看法和意见，这自然会相互影响，提高人们的认识。例如胡耀邦就对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特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用“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代替了邓小平长时间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他也是最早用全球化（不限与南北关系和以南方为主）的观点看待发展问题，并最早提出了中国经济翻两番的快速发展战略的领导人。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赵紫阳在报告中更明确把和平与发展定为世界主题，说成中国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据。这就使和平与发展回到了时代特征的地位，而不再只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了。当然，中央对时代问题认识的提高和加深，都是在邓小平的认同和指导下进行的，否则也不可能变成党中央的观点。在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上，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对国家和人民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没有这个转变，就没有“十三大”正式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战略，也不会有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¹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为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把两千年停滞的中国经济一下推上一个高速发展轨道，使我们竟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翻身，创造出一个独步世纪之交、得到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奇迹”。也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三）学界的研究和讨论

¹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2页。

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上两大问题后，就在学术界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界引起了关于时代问题的热烈讨论。我在1986年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而且许多论断在当时就不准确；我们由于受到《帝国主义论》的束缚，没有看到二战后不久世界就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仍然按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认识制定国内外政策，这就使我们丧失了三十多年最好的发展机遇，在国际社会中大大落后了。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多数与会者的批驳和反对。而且随之从会议室走向报刊，掀起了舆论上关于时代问题历时多年的大讨论。讨论中意见杂陈，但主要的有两种，一是认同和平与发展时代，一是坚持国际共运中的正统提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后一提法是从苏共“二十大”对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修改而来，并得到1957年和1960年两次有中共参加的国际共运重要会议的确认。经过长时间争论，到1990年代中叶，学界的意见渐趋一致，多倾向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认识。经过几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也更加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定性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应该说，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已经划上了句号。其实不然。

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对时代问题缺乏权威解释，因而既没能改变一些人的传统观念，又造成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时代认识发生反复和动摇，并影响到国民情绪和领导决策。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例如1989年“六四风波”后，陈云就让邓力群连续召开理论界会议批判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又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更掀起了一阵反对和平与发展提法和呼吁备战的热潮。一位国际问题研究者张文木大呼“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该迅速准备……对付同美国的正面冲突”。一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也连续发表李崇福等人的文章，批判“实际上是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所谓‘和平与发展’”。“左”派作家魏巍也著文参加批判，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总之，在那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否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倾向，成了中国舆论的主流。

对时代问题谈这么多，且大大超出了共和国前期外交的时限，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由于对时代的认识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决定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所以有作比较详细说明的必要，这对讨论具体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也当会有所帮助。

第二，改革开放后反思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当局和舆论导向对其他一些问题都作过不同程度的拨乱反正，惟独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缺乏反思，认定外交上是一贯正确的。这不但妨碍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而且使有关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舆论长期偏“左”，对内对外都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宣传上以爱国主义为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反西化、反和平演变的口号下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进一步推行愚民政策，维护一党专政。

第三，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时代学说，人们对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的认识不够自觉和彻底。过去就曾一再传出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等言论，不但时不时地造成一点人心惶惶，更重要的是影响决策。如十多年来接连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就违背时代精神，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引起外界议论，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注视和警惕。

最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不断加强各国的相互依赖和荣衰与共的关系，这一趋势正使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平与发展时代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两大时代特征，适应时代潮流，对整个国家以至每个人都十分重要。

虽然十多年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已把“左”派人士的几次分析和估计打得粉碎，但他们的极左立场并不会改变，还会不断跳出来扰乱人们的视听。这是因为第一，中共在改革开放以来，对过去执行的错误路线从未做过认真的清算，使“左”的思潮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按照舆论一律的原则，舆论导向和多数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了这种极左思潮的守护者和执行者，独立思考和不同的声音就只能是少数，且不完全合法。其次，每次极左思潮的宣传鼓吹，都会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一阵阵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舆论导向和领导决策。最后，总体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执政党在政治上的需要，为的是用名

为爱国主义实为民族主义煽动群众情绪，来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使群众支持领导的政策，或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的不满情绪。所以往往在重要时刻就会流传领导人的话语，强调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等。至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他们也经常动摇，需要时说得很响亮，遇到风吹草动和舆论上的压力，就会后退，表现了对国际形势缺乏根本判断和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不深刻不坚定。应该说，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理论最讲彻底性。■

【述 往】



作者简介：韦文德，男，壮族，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人（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初中文化。1951年5月生于原柳江县三都乡屯马屯。童年到少年时代在三都街生活并艰难成长。1963年夏进入柳江三都中学读初中，1966年6月在柳江三都中学初中毕业，并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革十年中没有居所、没有户口，到处流浪、避难。1976年到河池金城江镇投靠在彼地工作的长兄，后落户于河池县金城江水洞二队（蔬菜生产队）。1978年政策逐步开放后，从事个体工商业。2000年后户口迁回柳州市，现居柳州市柳南区航惠路8号3栋1单元402号。一生无缘任何职业、单位，谈不上退休，现居家养老，每月可领115元养老金。一生唯一可以向人道之的身份是“柳州市诗词学会会员”。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节选）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

韦文德

前言

生来正遇风雨稠，困苦饥寒度春秋。

名入另册遭歧视，身陷异己作楚囚。

低眉忍受千夫指，俯首似若猪马牛。

青春虚度铅华尽，岁月无情付水流。

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伴随着共和国出生，也伴随着共和国的苦难成长。他们的一生太多的不幸和冤屈，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找不到他们曾经的足迹，哪怕是淡淡的一笔。他们的遭遇一直被社会所忽视。由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出身，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他们更无法享有做人的起码尊严。他们也有崇高的理想，他们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们当中不乏才华优异者，但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他们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们曾经渺茫，曾经绝望。改革的春风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被那曾经疯狂的岁月消磨殆尽，他们的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光已被无情地蹉跎。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含恨郁郁而终。在新时期的改革浪潮中，他们当中也不乏成功者，这恰恰证明，当年对他们的歧视，对他们的不公，埋没了他们大部分人的才华，也毁掉了他们的人生。假若，他们都出生在今天这样的年代，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家……也将会出自于他们这个群体。

近年来，书刊里、报纸上，追忆“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苦难经历的文章、电影或电视剧连篇累牍。但是反映农村“地富”子女的冤屈和不幸的作品，却难得一见。虽然在一些电影、电视中也穿插着这类人物的不幸的身影，但却仅仅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对造成他们这个群体不幸的根源——阶级斗争年代的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难道他们的冤屈和不幸真的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同情？这依然是一种不公。我对此体验至深，和所有相同命运和遭遇的人们，有着难以忘却的痛楚。

人们习惯于给“伟人”、“名人”树碑立传。或者自己写《回忆录》，写《自传》，来回味自己曾经的辉煌。然而，我只是阶级斗争年代中的一个“政治贱民”。和我与生俱

来的只有苦难，没有辉煌。为此，我不否认我曾经心存怨愤。我在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伴随着共和国起死回生的变革，我也获得了新生。在我并未志得意满的年届花甲时蓦然回首，自己前三十年的青春已悄然远去。这后三十年的人生道路还在延续。尽管在这后三十年的路上也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但却让我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仅此，我已经感到满足。我为那些被疯狂岁月摧残而过早消逝了的青春而惋惜。也为自己已经被蹉跎了的年华而感慨。于是，我决心把我所经历过的，过去了的人生如实的记录下来。《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就是我前三十年人生所经历的，至今难以忘却的历史片段。为后人留下一缕追寻历史的踪迹，这就是我的初衷。

—

在一个偏僻、荒凉、贫穷的小山村里。那里没有山泉，没有河流。全村人靠着村后山腰岩洞里的石缝中，渗出并汇聚成一股牛尿般大小的一涓细流，人们用竹子破开做成水涧，把水引到村子边上的一个小池子里，大家分着食、用。过去村里人少，不是早年还是基本上够用。如果是早年，就要到几里地外的山沟下面的积水坑里，一瓢一瓢的把坑里带有鲜肉般红色沙虫的积水，舀到木桶里挑回家中，倒在水缸里沉淀后食用。这就是我出生的故乡。

屯马村中始终是同祖同宗的韦姓一族，别无他姓杂居。本村族人因世代受韦氏“一经堂”“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祖训的熏陶，崇尚血脉亲情，崇尚文明礼仪。从立村以来经过清朝到民国的近300年历史中，这个小山村曾经历过豺狼虎豹及风火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曾遭受过“绿林”、“红头军”等形形色色土匪强盗的掠夺和戕害；也不例外的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在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面前，族人间总能自觉同心协力，共同面对。虽为此曾经流过血死过人，但从未屈服过。

树大分丫，仔大分家是人类生殖繁衍的自然规律和生存逻辑。在这个村子里，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也就越来越多了起来。虽属同祖同宗的族人，由于“家”的存在，其

长幼亲疏自然也就有所区别。各自都在为各自的“家”而奋发、努力，这都在情理之中。亲的割不断，假的系不来，自立村以来十代人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族人间相轻、相辱、相残成仇的记载。在生产生活上，囿于各人的辛劳勤俭不一，各自能力和智慧的高低有别，贫富终究难以平均。囿于当时代生产力的落后，加之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土地资源的贫乏，从这个村子里实在难以找到真正意义的“财主”。只有相对于穷者的富裕。且这样的富裕也只能是通过超乎于吝啬的节俭手段来达成财产的积累，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贫富有别的社会现象。由于村中一祖同宗的血缘始终维系着族人间的关系，在出现危难之时，总还能相帮相助，从来不懂得把人按贫富分成阶级而相轻、相辱、相仇。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贫富有别而相互掠夺，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贫困而饿死人的故事。

二

离村子东侧的水池边，五六丈多远的村子中间，有一排三进六间的土墙瓦顶的房屋，那就是我家的祖屋。但我仅是在襁褓中时，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我们家就从那里被扫地出门了。以房子作为贫富区分的标准，我家那房屋与村里其他家的房屋，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整座房子唯一显得豪华的就是那门头板上雕着一只蝙蝠，但仅此一点也并不算得是与众不同，其他人家的门头也有同样的雕饰图案。在村子里我家算得是富家之一。但我家这富裕却常常成为族人们谈笑的资料。人们常取笑我们家的富裕，是我爷爷勒着裤腰带省下来的。这贫与富只是相对而言。在村子里贫的富的同样要下地耕作，同样喝玉米粥、燕麦粥，农闲时同样要吃红薯啃芋头，穿的同样是自己纺纱自己织，自己用蓝靛染的布，自己手缝的衣服。村子里有瓦房也有草房，住草房的毕竟是相对贫困的人家。想过好日子是所有人的愿望，谁都不愿意过穷日子，富足之家脸上总是多一点光彩。

我们村耕地少，除了在村子前面的十来亩望天田以外，在村子周边看不到连片的田地。只有那山旮旯里或是山坡坡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一半石头一半土的旱地。在这样的地里种庄稼全靠天作主，没有雨就干旱，雨大了庄稼会连土带苗给冲走。而且只能种些红薯芋

头等杂粮。一年一季，收获少得可怜。而主粮就只靠村前和那些冲沟旮旯，一小块一小块靠积水坑的积水浸润的望天田，种植的一年一季的水稻。年成好，从这些田里打的粮食也够一家人逢年过节时吃几顿干饭，平时舍不得吃，而只能喝两餐玉米粥或咽些红薯、芋头之类的杂粮了。我们的祖先就靠耕作这样的土地而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

从太爷爷传到爷爷手上，我家约有三四十亩这样的田地。爷爷秉承太爷爷的家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靠没日没夜地伺弄着这些田地来支撑着这个家。从爷爷到父亲已是两代单传。爷爷不指望他一向不安份的独生子能为他分担他肩上的担子，唯有引领着他的儿媳妇——我们的母亲，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里里外外的操劳。母亲生了我们这一大帮子子女女，兴旺了这一脉人丁，结束了两代单传的血脉承继危机，爷爷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爷爷不免要谋划这一大家子日后的衣食住行、成家立业和发展壮大。这一切不都靠从田地里去抠吗？有了田地就有了希望。而仅靠原来这点田地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人的，必须规划着如何再添置些田地，于是爷爷更是勒紧裤腰带拚命的干，一切开销都更是加倍的精打细算。家里点的煤油灯从来都是扭到如萤火虫般的光亮，不到天黑一定不能亮灯，这是爷爷定的规矩。家里吃的盐是爷爷严格控制的，掉落在地上的盐粒都必须捡起来，一丁点儿也不允许浪费。爷爷爱惜粮食胜过他的生命，平常日子是绝难吃到干饭的。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做一顿白米干饭，而且还不能煮得太干，那样饭量少用米多。母亲是领会爷爷的良苦用心的，在量米煮饭时都尽可能的弯着手指，在米筒口刮得尽量凹下去一点，煮的时候尽可能的多放一点儿水。但令母亲一生耿耿于怀的，是母亲生二哥坐月子时，才刚满三朝就要喝馊了的燕麦粥跟随爷爷下地干活。这件事情母亲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对我们念叨了一辈子。

爷爷对这个象男人一样泼辣刚强的儿媳妇，从心眼里是认可和同情的。母亲跟着爷爷耕田耙地、播种插秧、砍柴烧炭、放牛喂猪、纺纱织布、缝补浆洗无所不做、无所不会。对于奶奶对父亲的袒护和对母亲的苛刻，母亲忍无可忍时免不了顶撞几句，但这里里外外的事还是要母亲来做。那时奶奶已是体弱多病，只能在白天母亲下地干活时，在家帮照顾

孩子。晚上母亲回来后就都丢给母亲一个人了。母亲的艰辛爷爷是理解的，每当奶奶无端数落母亲时，爷爷总是平静的为母亲说几句公道话。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奶奶生病死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白天跟爷爷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做饭、喂孩子、喂猪，每一天都要起早摸黑不停不歇的干。

被爷爷指责为不务正业的败家子的父亲，不安份于农耕劳作，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父亲把一大家子儿女丢给母亲不管不顾，一直在柳州以杀猪卖肉或者贩些花生黄豆之类的小生意为业，小本生意所赚不多，除了吃饭要花钱，每月住客棧也要花不少钱，再加上父亲又沾上赌博的市井恶习，而且又赌得不精，经常中人家布下的局，连本钱都输得精光。所以从来不见往家里带钱，反而是一次次回家哄爷爷，说是要做什么生意，需要筹集些本钱。不管爷爷乐意不乐意，撮起家里的存粮挑到柳州卖，得一点钱又可以捣鼓一阵子小生意，待手头攒得有点钱时，又忍不得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下注。最终的结果都逃不过一个输字，只好硬着头皮，提个斤把肉、斤把盐的回家对爷爷重复着同一个理由。重复得多了，爷爷也就不再去考问他的真假，破口大骂一阵后，还是无可奈何的，由着他为所欲为。父亲在爷爷心里的形像已经无法改变，所以父亲的主张、父亲的打算，爷爷根本不去考虑他的正确与否，听都不听。父亲由于长期在柳州闯荡，体验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区别，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永久的城市人。父亲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卖掉家里的田地，到柳州沙街买一间房子，一则可以作铺面做生意，二则可以把全家人搬到柳州住下，作城市人、作生意人。房子已经物色好，就待付款成交了。父亲回家与爷爷商量时，还没把话说完，爷爷不容争辩的对父亲怒吼道：“你这个败家仔，你不把这个家败完是不甘心的。你把田地卖光了，叫我们一家子老老小小陪你去柳州流浪？你别白日做梦，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作主，除非我死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对爷爷说：“你死守着这点田地，累死累活的，一年到头，照样要啃木薯咽芋头，饭都不得吃一餐饱，一家人去柳州有什么不好？做生意哪点不比种田强？就是到柳江河边挑水卖都比在这个山旮旯过得舒服。你就守着自己的这点地吧，明天你就累死在你的地里，让你永远守着自己的地。”父亲无可奈何地走

了。那是临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那时大哥正在龙城中学读书。

家里只有爷爷和母亲是无法伺弄这么多土地的，爷爷只好忍痛收留本宗族一个孤儿“二哥”来帮工，后来又收留了一个外乡流落来的逃兵老梁在家帮工。老梁家在忻城县，土改前就向爷爷辞工回他家去，为了逃避抓逃兵，爷爷帮他乔装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让他徒步沿着公路回到他的家。他回到家后还给爷爷来了一封信报平安。土改过后，知道我们家划为地主，也还不时的来走往探视，像亲戚一般。那时请帮工一年要给几担谷子、几双鞋、几套衣服，那都是有行价的。至于房族二哥，那是本家兄弟，无父无母的，除按例要给谷子、衣服和鞋子外，爷爷还为他作主娶了个老婆。

母亲在心里赞同父亲的打算，她希望爷爷能同意父亲的提议，但她又不能公开的站在父亲一边。她知道爷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是母亲从心底里也厌倦了这穷乡僻壤的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艰苦而枯燥无味的农耕劳作，也向往着城市生意人的生活。我们三姨家就在谷埠街开了一家客棧，叫“容兴客棧”。当时大哥在龙城中学读书，就寄宿在三姨家里。母亲每一次给大哥送学费送伙食时，也都投宿在三姨家里。母亲看着三姨家所过的生活，再回想自己为了给孩子送学费、伙食，挑着一担米走七十多里路到柳州，一路上一碗茶都舍不得喝。两种生活的对比，再加上三姨忙着生意，有时不免冷落了她，她那心中的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就不禁油然而生出也要做个城市生意人的想法。但是父亲自顾逍遥，在柳州金屋藏娇养小老婆，儿子在龙城中学读书，近在咫尺他都不管，还要母亲从家挑米来交学费、伙食。为此母亲一直心存怨恨，和父亲在一起时总免不了恶言相向，巴不得爷爷把父亲骂个狗血淋头才解恨。再者母亲也拿不准父亲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也就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主张了。

三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偏僻贫穷，但却沿袭了祖先崇文尚武的传统。村里的文化气息一直以來都比较浓厚。从爷爷那一代起，村里的男孩子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文化启蒙教育。村

里人都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人们农闲时聚在一起，都喜欢吟诗作对。爷爷和父亲还都可以在过年时往自家门口贴上自己写的大红对联。村里每年都请有塾师给村里小孩子启蒙教育，到大一点后，就送到圩上读高小、中学。家里有读书人是一种荣耀，只要能考上，不管家里再穷，也会千方百计送孩子上学的。当时大哥和两个小伙伴同时考进龙城中学。他们俩家里人口少，比我们家有钱，学费生活费不愁交。我们家就只能由母亲挑着米去给大哥交学费了。大哥在学校的伙食费经常接济不上，有时就不得不到湾塘路口去喝粥。大哥当时在学校里算是穷学生。在龙城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干部梁山写的《柳州星火》这本书中，曾以大哥作为穷学生“覃文斐”的原型，我从大哥保存的几十年前在龙城中学读书时，和同学在柳州东门沙头角照的相片中看到，大哥确实是一派穷乡巴佬的形象——瘦小的个子，穿着宽大的土布裤子，短短的衣服。但是，当时能在龙城中学读书已是很了不起的。大哥曾经历过当时龙城中学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如“寻师学潮”。但是因为年纪小，还不懂什么政治斗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大哥也正是因为因为在龙城中学读的这几年书，铺就了他以后要走的这条人生的路。

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比较严重，女孩子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大姐比大哥大三岁，她只能帮妈妈带弟弟妹妹和在家帮奶奶做家务事。大姐十八岁那年，爷爷不但不给父亲卖掉土地，反而趁当时地价便宜，倾尽全家历年的积蓄，把所有的陈粮变卖，买下了十多亩邻村的好地，圆了他的发家梦。爷爷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好梦不长，就在大姐二十岁那年，村里搞土改，给每一个家庭划了阶级定了成份。“塘里无鱼虾子贵”，因为爷爷置的那些田地，也因为父亲当了几年的村长，我们家被划为地主。土地被分掉了，房屋被农会没收了。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历年的积蓄在爷爷买地时都已花得精光，只有一些留作一家人青黄不接时备用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不多的粮食，还有母亲自己织的几丈土布，全都被没收了。家里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恰恰在这样的年头，我却降生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我一生中所有的坎坷和不幸只能说是命中注定了。大姐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为了摆脱家庭的不幸，也为了寻求她个人的生活出路，含着眼泪，用稀粥喂饱了襁褓

中的我，然后黯然地跟着迎亲的人悄悄地走了。没有嫁女的喜宴也没有出阁的仪仗。母亲含着眼泪把大姐送到村外两里多路，千叮咛万嘱咐后，才满怀失落地伫立在坡顶路旁，泪眼模糊的看着大姐的背影渐行渐远。母亲为没有给自己的长女哪怕是一件自己织的土布做的新衣服作为嫁妆而内疚、自责。大姐嫁到邻乡的潭村一个贫农家里。大姐离开了这不幸的家，但她的心却一生牵挂着母亲和弟妹。

大姐出嫁了，一家人在饥饿中渡过土改后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对我们家的遭遇，当时在贫协里当文书的房族二叔深表同情，适逢当时“广西人民革命大学”招生，二叔私下给大哥开了一张证明书，还把他仅有的两块大洋交给了大哥，叫大哥去南宁报考“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光两块大洋是不够到南宁的路费的，二哥不得不含着眼泪，把他心爱的小花狗牵到三都圩上卖掉，才凑够大哥的路费。

小花狗是二哥从小养大的。它一身黑光发亮的毛，在它背部中间有一块巴掌大的白毛，就像一朵正在开放的雪白的花。它那两只灵动有神的眼睛上面，各点缀着一个白色的、和它的眼睛一样大小的、闪亮的圆点，好像在它的头上长着四只眼睛，使它更显得俏皮活泼。小花狗一直跟着二哥形影不离，很通人性。二哥和三哥在山里砍柴或者下套捕鸟，它都脚前脚后欢快地围着他们转。每当他们有所收获时，它更是汪汪的叫着跳着，欢快的摇摆着它那乌黑的尾巴。三哥先天近视，走路时它就总是跑在前面，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它就停下来叫一声以示提醒，并回头看着三哥通过。碰着有毒蛇时，它就护在他们前边，汪汪叫着不顾命的扑向毒蛇，直到把蛇赶走。晚上，它就睡在二哥和三哥的床前。他们半夜起来撒尿，它都要脚前脚后的跟着。小花狗还跟大哥参加过打虎的壮烈的行动。二哥和小花狗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为了给大哥筹集路费，在没有其它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换钱的只有小花狗了，二哥只得忍痛决定把小花狗卖掉。大哥和二哥他们商量这事的时候，它好像已经知悉了二哥的意图，当二哥用绳子牵着它走到“乾超坳”上时，它就哼哼地直往后退，屈着两只前腿，瞪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二哥，象是苦苦的哀求，让二哥的心都快碎了。二哥哽咽着跌坐在地上抱着它的头，眼泪止不住滴落到它的脸上，滴落到

它的眼睛里。二哥的眼泪和狗的眼泪流到了一起，他（它）们的感情顿时也交融在了一起，它好似无可奈何地顺从的依偎在二哥的怀里，二哥从它嘴巴里哼哧的出气声中，感觉到它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它好像理解了二哥的悲苦和无奈，它不再哼哼了，它低着头，静静地跟在二哥的后面，不再像平时那样前前后后的跑得那么欢快。到了圩上，当二哥与买主讲好价钱，伸出颤抖的手接过那点可怜的钱，并将绳子交到买主手中的时候，二哥忍不住哀痛的心，嚎啕大哭地跑着离开。当他跑得远远的又情不自禁的停下来想最后再看一眼小花狗时，看到了小花狗哀号着，奋力挣脱了买主手中的绳子，朝着他追过来。但是又被买主追上来踩住了绳子，并牢牢的拉住。小花狗还在挣扎着向二哥扑过来，却被绳子扯得两只前脚离地像人一样的站了起来，还面朝着二哥猛蹬着两只后腿，两只前脚在不停的扑腾，无可奈何地绝望的汪汪叫着，犹似向二哥作最后的诀别。这时，二哥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他泪眼朦朦地转过头，无声地抽泣着，呆呆的站在那里足有十多分钟。直到再也听不到小花狗一点声息后，才低着头悻悻的往家走。他一路走还一路想着小花狗，手里紧紧攥着那卖小花狗得的钱。他深深地感到内疚和自责。

对小花狗的内疚之情，一直深深地刻在二哥的心灵深处，一辈子都没忘怀过。卖狗的经过情节，直到我们都老了，几兄弟在一起时，他还总是经常反反复复的叙述着。

大哥带着二叔给的证明书和大洋以及二哥卖小花狗的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小山村，沿着那条唯一的通往外面世界的，崎岖不平的路，走向新的生活。大哥真的考上了广西革命大学。大哥为他自己，也为我们一家走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一步。

四

爷爷发家的梦想——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在这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面前彻底地破灭了。前不久他还在为能够在自己的手上买进十几亩好地，为这个家添置家业而沾沾自喜，并因此而在族人面前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和荣耀。但是，这些土地还没有给他任何的回

报，便连同他那短暂的喜悦和自以为是的荣耀，以及他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随着他头戴猪笼糊成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曲屈着双腿跪在斗争大会场中央的那一刻，随着“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而烟消云散了。爷爷没有仇恨，因为那些斗争他们（包括父亲、母亲、大哥还有村里的其他地主富农一起）的人都是本村同族同宗的族人。被斗的人和参加斗争的人都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这是改朝换代，这是个人力量所无法逆转的社会大变革，是历史的潮流。就像清朝取代明朝，民国取代清朝一样的道理，人民共和国取代了民国。爷爷不懂得“社会进步”的大道理，他认为这是天意。爷爷对周易的阴阳五行、命理预测的研究有一定造诣，他信命。但是他在作出买地的决定之前，就没有预测到这场大变革。所以他更深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爷爷也坚信打破不平等的制度，换来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件好事。人不死粮不断，只要渡过眼前的难关，凭着一家人的勤劳，总不会低人一等的。但是，爷爷已经老了，他再也挑不起家庭这个担子了。父亲因为是民国时的村长，是国民党政权基层组织的人员，在清匪反霸的自新运动中，向政府自新，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大姐出嫁了，大哥又走了。家里这老的小的一共八口人的生活的担子，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母亲把能做事的二姐、二哥、连刚过七岁的三哥都一起算上，作了分工。母亲和二姐带着三姐和我，每天到附近邻村的田里割马草。二哥、三哥由一个远房四叔带着去山里烧炭。爷爷自己也不闲着，就扛把刮子到人家地里去扒拉人家没收干净的红薯、芋头、木薯，多少也能帮补一些。

母亲每天挑着箩筐，一头挑着装有玉米稀粥（准确的说是米汤）的葫芦瓢子，一头挑着我。二姐背着不到四岁的三姐。到了田里就把我放在田头草地上的树阴下坐着，叫三姐看着我。母亲和二姐就蹲在旱地里用手扯、用镰刀割。不是什么草马都吃，只有那匍匐在地上的，茎干青脆而带点儿甜味的，叫马鞭草的才能卖钱。两个人一天也就只能扯个五六十斤草。到中午饿了渴了，就到地头歇一歇，喝一碗稀粥。早餐和午餐也就这么一个葫芦瓢子的稀粥。母亲把它挂在树枝上，要吃了才拿下来。听二姐后来说，有一次，由于我们

躲阴的树太大，树枝太高，装稀粥的葫芦瓢子挂不上去，母亲就把它绑在树脚下。三姐闹着饿了，就自己倒来一碗和我一起喝，却没有盖好。后来我在玩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堆圆圆颗粒的野兔子屎，就一粒一粒的捡到葫芦瓢子里去。三姐看到后就叫起来：“妈妈、二姐，弟弟把兔子屎捡到粥里去了。”急得二姐赶忙跑过来一看，气得哭了起来，边要打我边骂道：“你这个蠢仔，人家饿得要死还舍不得吃，你把兔子屎放到里面去还怎么吃呢？”母亲过来后，从粥里一粒一粒的把兔子屎捞出来。后来几个人也还是不得不喝完那一瓢子稀粥，不然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家时，母亲挑着马草，二姐背着我，三姐就只好自己走路回家。回到家后，要给马草淋些水，放在阴凉处，到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挑到圩上卖，换回一些米来。一担马草也可以换得五六斤米。加上二哥三哥跟着四叔烧炭卖，也可以分得一点钱帮衬一下。村里平时跟我们家走得近些的左邻右舍、叔伯兄弟的，这个一撮芋头、那个一撮红薯，有送的，有借的，大家伙帮着助着，到开的荒种的地又开始有了收获，这个关也就熬过了。

那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观念和思想，也不那么怕受牵连，同祖同宗的，谁家有个灾有个难的，看不过眼就多多少少的尽点情义。到逢着共同的灾难时，如面对老虎野猪、土匪强盗、日本鬼子来犯，大家还不是一起拚着命的抱成一团。逢着村里谁家迎亲嫁女的喜庆大事，还不都拿着封包或撮几筒米的主动上门帮忙。然后再围成一桌一桌的凑在一起划拳喝酒，谈笑吹牛。平时的家长里短、恩恩怨怨的也就不再计较了。

那带着二哥三哥烧炭的四叔，性格豪爽，要强，平日里练武、干重活比力气，过年去乡里抢花炮，都爱和父亲较着劲儿，争着上场。在斗争会上，也就是为了出平日里的那一口气儿，上去就踢了父亲一脚。过后了也就没事儿一样。看着我们家困难，就送来一撮红薯。后来又主动跟母亲说要带二哥三哥去烧炭，几岁孩子能干什么？卖炭的钱照样一人一份，母亲说小孩子不会做，能跟你学就很好了，不要这样分，都是你辛苦，就随便给一点做个意思得了。四叔就是不肯。当时四叔还没娶老婆，几年以后我们家已经搬到圩上住了，经母亲做媒给四叔找了一个好老婆。

母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终于熬过最困难的一关，慢慢的恢复了元气。母亲也缓了一口气。这些日子里生活虽然艰辛，但在思想上，精神上还是轻松的，没有歧视，没有侮辱，人和人之间是和谐平等的。

五

我两岁时，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了。他在农场时，不知跟哪个师傅学会了中草药，用中草药医个外伤风湿、妇科不孕的一些病痛，还真有些效果。这附近山上有丰富的中草药，几乎能採全父亲所需要的，或者说他所会用的所有药品。父亲採全了他所需要的药，就开始在县内的几个圩场赶圩行医。所得收入倒也可以解决二姐、二哥和三哥的学费以及家里的油盐等花销。家里地里的活主要还是母亲打理，爷爷老了，只能给母亲搭个帮手。这个家，也就是母亲在当，名为当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支配的钱财，就是多操份心而已。

二姐、二哥、三哥他们那时读书已经是要到三都圩上的学校去读了，他们一大早起来，爷爷已经为他们煮好红薯、芋头，洗完脸，各人手里揣几个红薯，芋头，边走边吃，和村里其他小伙伴一起，不管是寒冬暑夏的，赤着一双小脚，紧赶慢赶地沿着那条崎岖的羊肠小道，每天一个来回，十多里路，除去上课就是走路，回到家里已经天黑。就着母亲煮猪潲的火光吃完晚饭，也就累得打磕睡了。拖着双板鞋随随便便舀一瓢水冲一下脚，忙着上床就睡了。那时候作业少，在学校就做完了，回家也没有灯做作业。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听到母亲舂玉米的声响，就要爬起来，重复着每天同样的程序。二哥原来在村里就已经读了初小，到圩上学校已是读高小。三哥是直接上学校从一年级读起，二姐是在三哥二年级以后插的班，和三哥同年级。尽管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成绩还总是名列前茅。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白天母亲和爷爷出去干活，家里就只有三姐和我。三姐的任务就是照看我。原来的房子分掉后，就在水池的上头，在村子后面最高的坡上分给我们两间草房。沿着水池边的不规则的石头台阶，往上爬二十多级才到得家。我那时还不能走那样的路，所以必须有大人

带着。三姐已经五岁多了，可以看着我，不给我乱走动。所以两姐弟每天就只有在家里面玩。

我四岁那年，爷爷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再也下不了地了，只能在家里照看我和三姐。爷爷不喝酒也不抽烟，冬天里就带着我们坐在门背的火塘边避风取暖，肚子饿了爷爷就拿红薯、芋头放在火边煨给我们吃。过了年，爷爷已经是病得路都走不稳，父亲给的药也不管用了，红薯芋头是再也咽不下了，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能熬一点白米粥喝，父亲赶圩回来就买几两猪肉给爷爷补补身子。爷爷总是到晚上我们都睡着时，自己挣扎着起来煮，煮熟了就悄悄地把我叫起来：“老满，快点起来跟爷爷吃宵夜了，”其实我一直没有睡着，因为爷爷在我睡前就交待我：“爷爷煮好宵夜就叫你起来吃啊！”因为太少，姐姐、哥哥们就没有份了，所以我听到爷爷叫时，就乖乖地悄悄爬起来，以免吵醒三姐。没过多久爷爷就油尽灯枯的死了。爷爷病的时候也没麻烦家里多少，也不用谁倒屎倒尿的，都是他挣扎着自己照顾自己。爷爷临死时对父亲和母亲说：“本来我找了一卦好地，但是太远，花费大，家里没有钱，我死后，你们就把我葬在‘讲果杠’的旧瓦窑旁边那块平地里算了，那个瓦窑已经破塌了，是有点不太好，但也没有大碍，这样你们可以省点麻烦。”奶奶死的时候，爷爷把奶奶葬在他亲自选的一卦叫“飞凤含花”的风水地，而且那时家境还好，给奶奶做了三天道场，奶奶的后事还算风光。但是在爷爷过世时已是今非昔比了，父亲只能以一付薄薄的枫木棺材草草地将爷爷葬于村边不远的破瓦窑边。爷爷在抑郁和贫困中与世长辞了。

六

爷爷过世后，父亲也还是一直在今天赶这圩明天赶那圩的行医卖药。为了减少跑路的时间，就在外面借宿，经常不回家。家里的事实上就只有母亲在操劳。二哥已经在县完中读中学，在学校留宿。二姐和三哥还是早出晚归的到圩上读书，也就帮不了母亲什么事。三姐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再过两年我也可以上学了，那时就变成一家人都在跑路，家中

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柴草、猪食、孩子们的缝缝补补，母亲就是三头六臂也无论如何都做不完的。母亲就成天的埋怨着父亲不顾家，父亲辩解说：“我在外面不是去逍遥，我一天到晚挑着担子跑来跑去的，还不是为这帮孩子们攒点学费，这么多孩子读书，一到开学又要那么多学费，去那里要钱？不跑行吗？再说了，今天赶完这圩晚上要跑几十里路回到家来，明天早上又要赶早跑几十里路去赶那圩，跑来跑去我要跑多少冤枉路。”母亲听着也觉得是道理，但总是这样也不行呀。于是母亲便第一次心平气和的问父亲：“那该怎么办呢？”其实父亲早有打算，只是找不到机会跟母亲提出来，因为母亲和父亲只要见面就只有恶言相向，争争吵吵，从无商量可言。以前爷爷还在，有爷爷镇着，两个人都不好吵得太过余，爷爷死后，两个人就毫无顾忌地、变本加厉的见面就吵。这一次也是母亲因为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而且自己又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好办法来，就不得不和父亲认真商量了。

父亲见母亲这次是认真的要商量这事了，便也认真地说：“以前家里有田有地，我就提出要卖地去柳州买房子，一起搬去柳州住，老爹死活都不同意，还骂我是败家子，你当时也不做声。现在落得个地主成份，地没有地了，钱又没有钱，而且搬去哪里是要经过人家当地人同意才行。前一阵子，我试问了一回圩上的贫协老主席，老主席倒是很好讲话，他说现在都搞互助组了，大家的田地又一起合起来种，你来了又没有田地的，所以我也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如果你也同意搬去圩上，明天赶圩我就再认真的问一下老主席。”

母亲说：“去圩上总好过在这个山旮旯，至少这帮娃仔读书没有这么辛苦。就是住的地方怎么解决？”

父亲说：“前段时间我倒也留意过这个事情，圩上有一家姓梁的，他女人恰巧是你的同村姐妹，他们一家现在都在柳州，圩上的房子是空的。”

没过多久，搬家的事就定了下来。就要离开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小山村，还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我连我们家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印象，唯一的一个模糊的记忆，就是从我们屋后蜿蜒而下的水涧，和顺涧而流的滴落在水池中叮咚的水声。

家一天就搬完了。没有什么可搬的，就那几床已经睡得硬梆梆的老棉套和几床被烟熏得乌黑的，打满补丁的老蚊帐。父亲和二姐各人一担就挑完了。三哥就扛些锄头刮子等工具。母亲的担子一头挑着锅碗瓢盆，一头挑着我，三姐跟在担子后面走着。我们是最后离开那个家的。没有恋恋不舍的感触。我只看到母亲的眼里似乎闪着泪花，迷蒙地看着那已显破败的茅草屋，抬起右臂，用衣袖悄无声息的轻轻地拭了一下脸，也不知是擦汗还是擦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后，把担子挑上肩膀。我被母亲挑着，带着朦胧的希望，踏上那条唯一的通往外面世界的，崎岖的山路。走向山外，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述 往】

文革中在顺义“八年抗战”（下）

王 理

二十一

有了这次“铁”一般的教训后，我更加玩命工作，积极要求入党，以换取“他们”的信任，改变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要想知道我的工作有多繁重，不妨先来看看我校当时的教育组都有些什么日常工作。

文革期间我校的日常工作和运行机制与现在的学校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差别就在于我们教育组的工作不仅仅只限于管理业务教学诸方面的事情，而是，除了政治学习由政治组管、后勤保障及修缮由后勤组负责外，学校里的一切其它事情都推给教育组来做。

校内的杂事，诸如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课堂上学生不服从老师管教引发的师生纠纷，几乎天天都有，都跑到教育组办公室来寻求解决。那时候政治运动多，全校大会也多，会场的安排和主持都是教育组的事，甚至连会前把扩音器和喇叭搬到会场并调试好，会后再搬回教育组办公室都是我的事。学校要是开一次体育运动会，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全是教育

组的事，领导只负责开闭幕式讲话。

来自校外的杂事，诸如像一年一度的招兵工作，除了政审工作由领导和政治组处理外，学生报名填表、必要的家访或接待家长来访等具体操作都是由教育组来完成。再如外单位来学校联系校办厂产品的产销问题也都由教育组出面。

总之，你能想到的、又是领导不愿意管的具体杂事都推给了教育组，甚至包括收发报纸、信件，接听电话、找人等杂事也是教育组的工作（学校唯一的一部电话机就安装在教育组办公室里）。也就是说一般单位的“收发室”的事情也都由教育组来做。

为了落实“最高指示”关于“开门办学”的方针，全校各年级20多个班每年都要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这更是教育组的份内之事。这些事做起来非常麻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比如：有的工厂并不愿意接收学生来给他们干活，尽管学生是白干，不要任何报酬。我们只好多跑几次央求厂领导费心安排，请求理解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落实“最高指示”的精神，还要向他们保证出了事故不要厂方负责等等。

“开门办学”还得形式多样化，必须“走出去，请进来”。有一次，领导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农业中学在“多种办学形式”方面成绩斐然，有“经”可取。GP主任便让我骑自行车去那里联系参观取“经”事宜。那时候的公路沥青路面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土路甚至是乡间田埂小道，我早晨很早就出发，晚上天黑了才回来，来回足有260里。过了3天，他又让我再去一趟，说上次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对方在参观前说清楚。我心里很不愿意，因为实在太累，但是不能违抗他的“旨意”，结果等于一周内我骑自行车跑了两趟香河，累得我好久缓不过劲儿来。

最后，为了工作的“方便”，主任GP干脆命令我从集体宿舍里搬出来，一个人单独住到教育组的办公室里，这样就保证了无论白天晚上还是节假日，学校随时都有值班的人，不会耽误领导的“大事”。

教育组的事情虽多，我们全力以赴、一件件地去做，不用求人最后总还是可以凑合的。最头疼的是星期一早晨第一节课时，常有周末回家的老师没有及时回来上课，必须马上有

人去顶替；还有给请了病假、事假的老师安排代课的事情。只要我们俩能脱得开身，一般我们都自己代课，就怕实在脱不开身，不得不找其他同科老师代课时，就非常为难。多数老师通情达理，也理解我们的难处，给以积极配合。也有个别老师确实也有实际困难不能合作时，只能随即调课后再由我们自己来代。好在那个年代不追求教学效果，只要在上课的时间，每个教室的讲台上有人站着就行。所以基本上什么课我都代过。

白天忙忙碌碌一天，像无头苍蝇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生放学后，已是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不动也不想动，感叹这一天总算又熬过去了！

可是 GP 主任好像还觉得大家不够辛苦，他又想出一个“新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为了不让学放学回家后被资产阶级争夺了去，无产阶级必须要主动占领学生的校外阵地。怎么办呢？

农村的学生放学回家后有的是农活可干，资产阶级不易争夺了去。非农业户学生就不一样了，要求政治组和教育组联手组织老师们晚饭后分别到各工厂、单位和部队营房去把学生再召集在一起，给学生讲解报纸上的“社论”和时事新闻，或者组织学生给工厂做义务劳动，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行为抢占了学生们的课外思想阵地。

老师们当然有发牢骚的，可我不能！我还得带头。有一次我扁桃体发炎，高烧 39 度，打了一天青霉素，刚退烧到 37 度的当天晚上，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坚持去了。

二十二

自从县教育局的一位局长教训我要搞“专政”而不要搞“专业”以后，我意识到我只有扎根顺义这一条路了；还有，如果我不入党，我在学校的糟糕处境无法改变。而要想入党，只能拼命工作、维护“他们”的利益、委曲求全去搞好与“他们”的关系，别无选择。

思想上“明确”了，行动上就必须跟上，尽管心情是灰暗的。不再胡思乱想离开教育口的事了，也不再往城里乱跑了。面对教育组如此繁重的工作，我必须做到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顶多自己吃苦受累一些，而我从来不在乎吃苦受累！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多数人的胸怀也是正直的，我的所作所为谁都可以看得见的。有一天，我去政治教研室办什么事，恰好只有女老师张玉云一个人在，说了两句话后，她便善意地开导我：“王理呀！你可得悠着点干啊！你一个人干的活儿比我们三个人加起来还多呀！我们都够劲的了，你能不累吗？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张玉云老师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清楚我在学校里的处境、地位。但是有人是看清楚的。我前边提到的那个主动请缨教高中数学课的老师就是一个清醒的人，他曾在好几个老师同时在场的情况下，直言：“别看王理他是个教育组组长，相当于过去的教导主任，你随便扒拉过来一个党员的脑袋就比他高得多！”这话说得一针见血。

有一次GP主任要讲“党课”了，政治组组长张老师主动通知我去听“党课”，我天真地以为这可能是因为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党组织要把我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的一种体现吧！后来的事实说明这纯粹是我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在此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内，GP连续发展了3批党员，每次2人。从文革以来这么多年，学校从来没有发展过党员。在发展第一批党员前夕，许多群众私下议论可能有我，结果发展的是刚调来学校半年的两个19岁的女孩。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两个女孩年轻单纯，工作热情高，更重要的是本乡本土的人，GP当然要扩大自己人的阵地。像我这样外来的“老油条”当然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考验，我能理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半年后第二批发展的两个党员中，就有前边提到的那个“混娘们儿”，这一下我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了！而且我相信教师中稍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了这个学校的“奥秘”是什么了。

后来我在街上碰见前主任甄君良，他坦言：“王理呀，你得努把力了！连M某某都入党了，你怎么还没入上啊？”我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其实我心想：“‘混娘们儿’的绰号不是你给她起的吗？党要她这号人，肯定就不会要我了嘛！”

一次回老家探亲，和一个老同学闲聊起我的困境以及入党难的话题，他的弟弟在一旁插话说：“啊呀！我说王理哥啊！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指我和他哥）就是太迂腐了！想不开嘛！你看我的党票，两瓶二锅头就拿下！”原来他发现他们学校的书记爱喝酒，他提

了两瓶二锅头去了一趟书记家，不久就发展他入党了，再后来他又被保送北大工农兵学员。我回答他：“别说两瓶二锅头，十瓶茅台我也送得起，问题是我的情况特殊，你不了解！人家正设法找我的“茬”呢！我若真要背着10瓶茅台晚上去他家送礼，他第二天把酒拿到学校一公开，人赃俱在，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完了！”

二十三

我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我总感觉到GP是用党票做诱饵吊我的胃口，真实的目的好像是要累死、整死我。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不出原因。所以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不妨摆一摆事实看。

首先，我对他非常尊重，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出半点自负，反之，甚至于都有拍马屁的嫌疑。比如，他有高血压，心脏不太好，我经常劝他多休息爱护身体，具体的事不必操心，由我们来做。别说对他，就是对其他普通党员我也是敬重有余，不敢有半点造次。我自己都感觉到与学生时代的我相比，判若两人。

第二，我的工作态度、表现以及我的实际付出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挑不出大的毛病。这方面我最放心。

第三，我听说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必须要有一个或者两个联系人按照组织的意图与之谈话，指出缺点和不足的地方以便改进。可是从我提交入党申请书到我离开顺义的3年中，从来没有一个党员找我谈过一句话，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一样，除了政治组长通知我听党课那一次（可是有许多非党员都是被通知对象）。当然，我不懂中共的章法，也许我的说法本身就不符合共产党的“规矩”，还请中共党员们指正。

如果仅从以上分析就断定自己的猜测正确，显然不够充分，未免主观武断。我必须设法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这个人敢做就敢当，不怕暴露自己丑陋的一面。

当时，学校是上午11点半放学，到了夏天下午3点才上课，中午有长达3个半小时的

时间。嘈杂的学校一天当中只有这一段时间最安静，比下午放学后还清净。

每天的报纸和信件很有规律地在中午 12 点前送到教育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办公室，前边说过收发室的事情都是我的任务。有一天我发现信件中有一封是从陕北米脂县某单位寄给我校“政治组负责人”的信，引起了我的好奇：米脂县是我的籍贯，穷乡僻壤的米脂县能与这个学校有什么关系？我猜测此信很可能与我有关！

我知道私拆“组织”的信件是十分危险而且也是十分下作的行为，有悖于我的人格信条。可是为了弄清 GP 代表的“组织”究竟要对我干什么，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思想斗争一番后，我用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看完后用浆糊封好开口，又恢复了原状，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不出我所料，这封信是调查我的一个姑父的历史问题的回函。

我这个姑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我父亲与他有通信联系。父亲写给老家的信都是写给他，再由他传递给乡下老家的人，因为老家的人都不会写信。我是从姑父的来信看到他的名字的。我从上中学以后多次填写过履历表，每次我都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亲戚朋友都填上。有的亲戚我只知其人、不知道名字，想填上也无法做到，比如我听父母亲说过我还有一个姑父是榆林市某纺纱厂的党委书记，与我家联系不多，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当然也就没法填。

我米脂县的这个姑父我一生只见过一次面，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来过我家一次。他是做什么事的，我一概不清楚。我偷看了这封回函后，才知道他原来是米脂街上一家旅店的账房先生。好在信上没有说他有大的历史问题。

偷看回函这种勾当我一共干过两次。另一次是调查我妹夫的家庭历史问题的回函。信上有他的出生年月、家庭出身、他父母亲的家庭背景、生活来源等等。结果我妹夫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看过这两封信后，我想到两点：第一，与我如此不沾边的社会关系都要调查，可以推断我父亲的单位无疑早就调查过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第二，联想到革委会主任 GP 在大会上说过的话：“解放后经过这么多的运动，我就不信你的社会关系中就

没有一个有问题的人？”很有可能是针对我说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社会关系中，我真没听说过谁有“历史问题”或者有谁在历次运动中出过大的问题。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除了我父亲之外，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的。而我父亲已经在1970年过世，死前虽然仍未“解放”，也未恢复组织生活，但是始终未查出实质性的历史问题。

接下来不久，发展了第二批党员2人，半年后第三批又是2人，全是本乡本土的“自己人”。把我晒在一边不理不问，反而背后秘密调查我的不着边际的社会关系，这不是在搜集我的黑材料是在干什么？所以我不能不得出结论：“组织”根本没有发展我入党的诚意。我不能再自作多情了！是到了我该彻底醒悟的时候了！

不过话再说回来，人家不发展我这种人入党也是对的。因为我的入党动机只是为了我个人的生存问题，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宏伟目标。我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过党员入党时，都面对墙上挂着的一面党旗举起右手这样宣誓的。我想，至少在入党前，他们的动机必定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否则不可能发展他入党；至于入党后，那就可以另说了，因为我发现与我共过事的共产党员中，多数都比较自私狭隘，就像GP那样。可以想象一个自私狭隘的人怎么可能抛却私利去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二十四

进入了1974年，革委会主任GP在任了3年多了，在最后的这一年半里他连续发展了3批党员，建立起了自己巩固的“基地”组织，现在要晋升为县民政局的局长了。

从革委会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委会副主任的姚某某，已经当了3届领导班子的第一副手，为人正派，人又年轻，按常规来说应该提拔姚某某当第一把手了，谁都是这样认为的，包括姚本人。可GP坚决反对，他选中的是与他“情投意合”的、在某公社一个小学校的J某某来接替他当第一把手，最后得逞的还是他。

他有他的人，我也有我的“线”。据“线人”说GP是这样给J某某交接工作的：他要

J到任后，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追讨欠债。在GP当年上任之初（或之前不久）调回山西老家的一位老教师史某某，因家庭困难向学校借过100元钱，人调走了钱未还，GP要J设法把钱追讨回来。

第二件大事，要J密切监视并处理“以王理为头子的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

啊！他终于把藏匿在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吐露了出来！

当我得知此事后，才恍然大悟！我原来的一切困惑和迷雾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他眼里定位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的人，他怎么可能发展其为他的党员？给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冠以教育组组长的“官”帽岂能是重用？还不是为了在你百密一疏的时候便于抓住你的辫子。只是我这个“头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是何时成立的？宗旨是什么？成员都有谁？

至此，我唯一不能破解的是：我与他素日无仇近日无怨，而且我又是如此顺从、如此卖命地为学校、为他效力，为什么还要如此不择手段地捏造事实加害于我？

常言道：“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难道真在我身上得到应验了？可我觉得我还远不够“龙”或“虎”的“范儿”，真没想到竟会有如此没见过世面的人！

我的“形势”再明朗不过了，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能去哪里呢？调回市内那是白日做梦，不现实。我只能离开县城去一个偏僻的小学戴“帽”的小学校，一竿子插到底也许最终会有反弹的机会，因为我认为最落后地方的人反而可能朴实厚道一些。我把我的思路写信告诉了家人，自己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申请到最基层去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是反其道而行，往低处走，去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总应该容易实现吧！

二十五

我这个想法的产生出于无奈，但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一方面，J某人到任后，甩开任何遮羞布，赤膊上阵，矛头直指“裴多菲反革命俱乐

部”，其实就是对准以我为主要矛头的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们，大会小会不断强调学校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危言耸听地告诫要警惕长期存在于学校内的一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我的身体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异常状况，我意识到再这样强撑下去，恐怕性命难保。

1967年底我来顺义之前，经过长期体力劳动的锻炼，食量很大，体重130多斤，可谓年富力强。到1974年中，我已是三十好几岁的人了，不仅不发福，反而体重下降到102斤（学校仪器室有一个可以精确到1两的磅秤，我穿着夏天的单衣单裤称重数为102.2斤）。

一次，全校教职工到县医院做X光胸透（这是我在顺义8年唯一的一次体检），大夫说我左上肺阴影为肺结核病灶，让我大吃一惊。同时，我的脸上出现很多“蝴蝶斑”，尤其在嘴唇四周最多。我当时不懂是什么缘故，以为只是过度劳累营养不良，现在我才知道这是肝脏代谢功能出了大问题。记得当时一个女老师善意地嘲笑我：“人家女人怀孕后，在妊娠期才有可能长蝴蝶斑，你一个大男人长什么蝴蝶斑呀？”

另外，常年的神经衰弱更趋严重，1974年整个夏天，尽管每天中午有3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可我连一分钟都没睡着过，晚上依旧是入睡困难，早上还醒的很早。看来我的身体状况在急剧下降，种种症状都是预警信号，低迷的精神状态使我有一种来日无多的感觉。

我写给家人的信，引起了一个亲戚的极大关注。他立刻回信给我说他有一个同事是北京下放的“支边”（支援边疆）干部，该同事在北京有一个朋友是老资格的工程师，与他是世交，该朋友又有一个朋友是北京市人事局的副局长。我这个亲戚说他可以“人托人”最终托这个副局长把我调回市内工作。

我一听他的这个规划，无异于一个美丽的梦想。1972年北京市委都下达了专业归口的文件，顺义县都不照章执行，现在就算你走“通”了这个副局长，难道一个副局长能比北京市委的权威更大不成？所以我对他的规划不抱希望，也就未加理会。

我还得按照我的思路走，惹不起就躲，去一个更小更基层的学校，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当初工农兵宣传队进驻学校的时候，宣传队中有一个贫下中农代表小杜与我关系很好，后来宣传队撤出后，一次在街上碰到他，说起他们大队的小学要带“帽”办初中班，我当

即表示我愿意调去。并且我再三嘱咐他一定要他们公社书记说服县教育局的头头，然后由县教育局给我们学校下调令，学校才会放我走。

我之所以这样嘱咐他，事出有因。

当初1972年我请求县教育局落实市委文件精神让我专业归口时，一位领导教训我要搞“专政”不搞“专业”，我就想到了，我想调走的事迟早会传到我的学校。后来，主任GP在大会上明确表过态：“谁想调走我都放，我不挽留任何人！有本事，你让上级给我下调令，调令一到，你可以立马走人”。

后来从小杜那里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他们的公社书记从县教育局那边得到答复：人家学校说了，你把我们学校的教育组组长调走，我们学校的教育革命还搞不搞了？我一听气炸了肺，堂堂一个学校的书记表面说一套，背后说的是另外一套，毫无人格可言！

二十六

对于自己走投无路的现状，似乎无计可施，又不甘心就这样白白把自己的命丢在这个鬼地方。此时，已经到了1974年7、8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不细说了）我得到一条消息：北京市委托北京工业大学建立一个计算中心，正在网罗学数学的人从事软件方面的工作（那时候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有计算机系）。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不敢抱太多希望，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不得不把“死马当活马医”。

就像我以前独闯冶金部大楼一样，我骑车独闯从未去过的北京工业大学，找到计算站站长毛遂自荐。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位站长不仅信任了我的毛遂自荐，而且没过多久，他在没有和我商量细节的情况下，居然带上北工大的介绍信亲自跑到顺义县教育局协商调动我的事。他真诚的“主动性”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他的“协商”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据他讲县教育局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事后他给我明确表态：顺义县什么时候放你，我们什么时候要你，剩下的事就得你自己想想办法了。

这时，我想起了我的亲戚给我提供的“线路”：那个工程师及其朋友——北京市人事局副局长。他二人同住在西郊的同一个大院里。从1974年的9月份起，我又开始了已经停止两年多的星期天往城里跑的做法，不同的是这次我是每个星期天都不落下，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由于动力足也不觉得太累。

然而，每次得到的信息都让我失望。我记得副局长给顺义县教育局都把话说到这种程度：“你们只要放他（指我）一个人，我明年夏天给顺义县多分配3个大学毕业生”。可是顺义县教育局就是不答应！真是“强龙难服地头蛇”呀！

1975年春季开学，我的学校有5位老师被调回北京，这是顺义县教育局破天荒地一次放走这么多人，就是不能放我走，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出什么样的解释？

人的耐受力毕竟是有限的，屡战屡败的现实使我意识到，眼下的这个社会如果不发生一定程度的质的变化，我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只能任人宰割随波逐流了，个人在社会这个庞然怪物面前，显得渺小的不值一提。我有点灰心丧气了，伴随着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我能做的努力都做了，我还能做的恐怕只剩下静等社会的变化了。

二十七

197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顺义县体委的体育场，露天公演了一部电影“春苗”，在电影开演前加映了一段“新闻简报”，其中的一组镜头让我全身颤抖了一下！为之一振，我好似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一组什么镜头呢？电影放映的是毛主席会见了一个什么客人，毛主席的头始终仰靠在沙发背上与客人谈话，会见毕，客人要握手告辞了。此时，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赶忙上前，双手把毛的头从沙发背上扶起成直立状态，以便与客人握手告别。

我为什么会颤抖呢？因为我突然联想起《三国演义》中司马懿的一句话。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在营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饭量却一天天在减少时，司马懿大喜，对众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果然，不久诸葛亮就病死在出征途中，蜀军不战自退。

联想到司马懿的话，我就想，一个人“若无举头之力，岂能久乎？”此时的我虽然已经山穷水尽，身体也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可我毕竟只有34岁，毛比我大整4轮（他属蛇，我也属蛇），我只要再咬紧牙关坚持几年，我就不信活不过他？

纵观中国历史，只要改朝换代，社会必定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总要给一些人带来机遇。由于毛自认为比秦始皇更胜一筹，所以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处在奋力挣扎或苟且偷生的状态。我预计一旦毛主席“驾崩”，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机遇将多于挑战。

我当时预计毛主席的寿命最多还有5、6年，屈指一算，届时我也就是40岁。看来，我有希望在40岁左右的时候，讨个老婆成个家，我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过上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心想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过了一年，他就被阎王爷招去。更没有想到他死了还不到一个月，他生前换了又换、挑了又挑才选中的接班人，与跟随效忠他多年的“大内总管”竟然联手把他的老婆——他唯一真正信赖的人——通过宫廷政变的手段给抓了起来，后来还判了死缓。

没想到的还有，据御用文人们的回忆文章说，早在1972年要不是众多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老人家差一点就“挂”了。那是因为一年前的“林彪事件”堵在他心窝的一口气出不来闹的。谁不知道林彪这个接班人是亲自选的？谁不知道又是他让写在党章里的？结果林彪还是投奔了他的敌人，幸好死在半路上。他这可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这真是自作自受！赖不到别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头上，周恩来越是对他像儿子般的恭顺、越是想替他擦这“一屁股屎”，可以想象他心里窝着的火就只会越盛，继而也就越想把这有名火发向周恩来。可是，不行啊！实在找不到借口发向恩来啊！

一般的80来岁的老人，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假如1972年那次，他老人家“过去了”，我在顺义的苦难岁月就差不多完全可以躲过去了！因为我在顺义的苦难主要发生在1972年以后。

可惜历史从来不能假设。

二十八

正当我又一次陷入绝境的时候，有“高人”给我出了一招，这一招还真灵，使我绝处逢生。事后，我反思自己，如此简单的一招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究其原因，还是自己看不透这个社会的本质，书生气太重。

“高人”给我指点迷津：你的问题不就是出在你的学校与顺义县教育局的头头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吗？那你就应该避其锋芒，迂回到他们的背后寻找他们的软肋，他们的软肋是什么呢？他们这号人别看在老百姓面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在他们的顶头上司面前那是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你只要把他们的顶头上司走通，那他们就连一个屁都不敢放了！

这真是真知灼见！而且道理浅显，让人一听就能理解。在这些“地头蛇”的眼里，什么党的政策、文件精神统统都是扯淡！他想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不想执行也有的是歪理！

那么，县教育局的顶头上司是谁呢？我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德高望重，待人和蔼慈祥。他是1938年在京郊西山打游击出身的抗日老干部，60多岁了仅是顺义县副县长，按共产党的惯例，他的资历与职位极不匹配，但他从不介意这些。平日对下属非常客气，不认识的平民百姓求助于他，他都全力帮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十分少见。

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还兼着顺义县党委文教组的组长，县教育局的几个局长再霸道蛮横，也得定期恭恭敬敬给老头儿汇报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救命稻草”，那个工程师和副局长，并建议他们不要再走通常人事调动的路子，即不再直接与县教育局打交道，而是打破常规，越过他们直接与县党委文教组联系，让文教组组长去做局长们的工作。

已经到了1975年年底，我知道工程师和副局长两人仍在努力帮我，并未放弃。我只能等待，但星期天我照例去他们的家里拜访。学校已进入期末考试阶段，教育组的烂事多得是，忙得我焦头烂额，直到学生放假的前一天下午，在教育组办公室J主任突然对我说：

“你的事行了！你明天去教育局办手续去吧”由于太突然，我愣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待回过神来后，我只“嗯！”了一声，由于我们两个人都心照不宣，我无需再多说什么。

晚上躺在床上，心潮起伏、五味杂陈。说高兴吧？心里好像没有多少喜悦。说难受吧？这是久已盼望的好事，难受什么？大概是兴奋吧！这下就更睡不着了！只听见同屋室友的均匀的酣睡声一声接一声。这位室友是调来刚半年多的一位老党员，本来他不需要和我一起住在这嘈杂的办公室里，大概也是组织考虑为了更好地“考察”我吧！不过这位老党员为人厚道，至少表面上与我相处得不错。

睡不着就得想事，越想事就越睡不着。

我想到，在我18岁那年，那是1959年9月1日，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去首都北京，而且是去北大读书，“金榜题名”我好不得意！兴奋而又自豪的心情可以想见。与我同车去北京的自治区男女篮球队的队员们（其中有两个是我的中学同学），投向我的全是赞誉而又羡慕的眼光。

如今我已经35岁了，没想到，在这过去了的17年里，就再也没有过一刻这样惬意的心境！反之，有的只是接连不断的磨难和痛苦不堪的回忆。

没想到，入北大后，对北大的新鲜感和北大未名湖畔那迷人的风景很快就被北大的极左政治气候完全淹没，政治运动成了大学生活的主旋律。低落抑郁的心绪贯穿了全部近6年的大学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只盼望能到一个不像北大那么“左”的单位就好了！又没想到，盼到的是从北大校门直接迈入一个比北大更“左”劳改基地——卢沟桥农场，从此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当我在每个月劳动休息的4天中，投宿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时，我又开始期盼了，盼望有朝一日能分配到一个具体的学校，好歹使我能有个归宿。

3年后这个期盼倒是实现了，更没想到，盼到的却是一个更为苦难的“8年抗战”。

想着想着疲倦了，天也麻麻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二十九

第二天一起来就赶忙往县教育局跑，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在没有拿到调令之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学校无论有什么烦事缠身，对不起！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到了县教育局，小严帮我把工作调动函和工资关系办好，在祝福我的同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羡慕的眼神，因为她也想调回北京。

返回学校的路上，步履格外轻盈。回到学校马不停蹄，立即把户口和粮食关系办好，把所有的调动手续全拿到手后，心里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踏实，这时我才敢说，我终于逃出了虎口！

这时的学校大门已经改在学校正西方向，紧靠通往通县的公路，一进校门就是一排办公室，从西向东有教育组、政治组、革委会3大间办公室，最里边的一间是J主任的单人卧室，我依然是住在教育组的办公室里。

学生放假了，教职工还没有放假，老师们以教研室为单位还在开会学习。我事先联系好了县运输队（在县麻绳厂旁边）的一辆卡车帮我运行李，卡车开进校门就停在这一排办公室门口，当我把我的行李从教育组办公室里搬出来，司机帮我把行李扔上卡车，这么大的动静，在革委会办公室开会的领导们不可能看不见这辆卡车，因为办公室门口距离卡车不足5米，只有敞亮的窗户玻璃隔开。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我送行，我当然也不会自作多情去与他们告别。

卡车驶出校门时我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它是公元1976年1月19日。

我发现人的情素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特别不好解释。

我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国外。有很多地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当然也有些地方给我留下的是不好的记忆，同样也是难以忘却。我奇怪的是我在梦中经常梦到的地方只有顺义县城关中学这一个地方！就连这个学校东北角的那个厕所我都梦到过好几次。

而第一次赴美读了5年书的那所美丽的大学，不能不说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可我竟然连一次都没有梦到过。这5年留学对我一生的意义，在许多方面堪称是决定性的，比如我在顺义8年被折磨垮了的身体就是在这期间得到了彻底地改观，体重又恢复到了130斤以上，有点驼背了的上驱又完全挺直了。现在同龄人都说我比一般人健康一些，我认为就是由于在美国连续生活了5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次都没有梦到过那所大学？而那所差一点要了我的命的破学校倒是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我每年至少要去顺义一次，主要原因是我妻子和我父母的坟墓我都安置在顺义的潮白陵园里。几乎每次去顺义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去看看那所学校。是爱它、眷恋它吗？完全不是！是恨它吗？也不尽然！它又没得罪我！那我为什么常想去看看它？我实在说不清楚。

每次去顺义城关中学都发现有变化，学校原来的平房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去时，发现最后还没有拆掉的两间原来的平房，正好是最早的校门口旁边、全校最西北角的两间，其中的一间我住了2、3年。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两间平房已经承租给私人做了理发店，而且原来朝南方向的门被堵死，原来的后墙被打开做成一个朝北的新门窗，这大概是市场经济的效应吧！还有一个写着“毛主席万岁！”口号的影碑（用水泥铸成的牌匾）还立在那里。

再一次去时，“毛主席万岁！”的影碑被拆掉了，可能人们更注重实际了！

两个星期前，我又去了一次，原来的一切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我找不到原来的城关中学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哪怕是原来的一块砖头、一个土块！一种惆怅的感觉涌上心头，于是我决定：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了！

三十

顺义县城关中学曾几度更名，我离开时已经改名为顺义县城关一中，因为又增设了城关二中、城关三中。现在的校名叫顺义第一中学，有一次我坐车路过时，还见到一个挂着“顺义第九中学”牌子的学校，可见顺义现在至少有9所中学了。

前几年，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当年的北京市高考理科状元出在顺义一中，

令我多少有点惊奇。因为按照我在那里时的情况来推想，不可能想象出，由那么低俗的领导挂帅的学校能培养出理科状元这样的人才。

我衷心祝福顺义一中蒸蒸日上、人才辈出。但是，即使在学校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们也不应该忘记文革中的顺义城关中学曾经有过一段人妖颠倒、惨淡经营的历程！■

2014年5月31日23时45分

【述 往】

我的俄罗斯梦

李南央

一

五十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北郊六铺炕的水电建设总局宿舍，我们住的九号楼和八号楼之间是一大片空场。那时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滴水成冰，机关的后勤部门在空场的东边泼上水，用芦席一围，便成了溜冰场。记得门票很便宜，好象是五分钱一张。冰场每天晚上都开，大喇叭里悠扬的音乐一响，人们便挤挤茬茬地在并不宽绰的冰面上欢畅地滑起来了。

爸爸1955年初从苏联访问回来，给我和哥哥一人带回一双冰刀。说它是冰刀而不是冰鞋，因为它是用前后两个皮带袪儿绑在脚上的，与那时的类似自制冰刀不同之处在于冰刀是双刃的。现在想想其实就是用块厚度约两、三毫米的窄条钢板压成槽形，槽形的两个立面就成了刀刃，槽形的底面前后各用螺丝紧上个鞋托就可以绑在鞋上了。前后鞋托的位置是可以调节的，以适应不同大小的脚。但这样一来，底面上开的穿螺丝的孔便是长方形的，螺丝非常容易松动，螺丝一松，鞋托就会打转。所以每次滑冰，都要随身带把螺丝刀，不时地将松了的螺丝拧紧。就是这样的蹩脚货，在那个简易冰场上也是稀奇物。我和哥哥从大人身旁滑过时往往会被他们拉住，让我们抬起脚来，看看我们穿的是什么高级玩意。这

些大人的眼光里没有孩子们那种酸酸的味道，都是一些认真的探究和仔细的琢磨，因此我们会得意地告诉他们这是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很愿意地把脚高高地举起，耐心地等待他们看个够。因为冰刀是双刃的，在冰上没有站不住摔跟头的危险，我很快就可以滑行自如，在大人们中间穿来穿去，这就更引来人们的注目。我对这种注目是十分得意的，常常会滑得忘记回家，直到冰场关闭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这片空地上盖起了平房，我和哥哥就只能去什刹海或者是北海的正规冰场滑冰了。这样多了穿大衣、乘汽车、存衣物的麻烦，滑冰不再是寒假期间天天必有的乐趣了。直到爸爸1958年第二次去苏联给我带回了一双真正的冰鞋，是黄褐色的，而且是打冰球的球刀，不是人人都穿的那种花样刀，又使我成了冰场上常常被人“拦截”的对象，这样滑冰的兴致又高了一些。

爸爸那次从苏联带回来的不仅是冰鞋，还有套人，橡皮吹气的玩具和其他的一些稀罕物。哥哥得到的是一只鹅，滚圆的短身体，细细的长脖子，杏黄色的头冠下是红红的嘴巴，非常可爱。给我的是一只灰不溜湫的兔子，肥肥胖胖的一坨，即没色彩也无线条，一点也不好看。有一次家里乱哄哄来了一屋子客人，客人散尽，发现那只蠢兔子成了一张薄片，赖赖地躺在窗户底下的暖气木罩上。细细一看，才发现不知是谁在它的背上划了一条通体的口子。妈妈一口咬定是我干的，可是精明的妈妈这次错了，我即使再不喜欢这只兔子，但它来自遥远的苏联，我还是珍惜它的，是绝不会下此“毒手”的。我说不是我干的，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因为我鼓捣死过家里的金鱼，为了探索毛裤是怎么织在一起的，剪坏过自己的毛裤，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的又一次恶作剧。任凭妈妈怎样晓知以理，动之以情，我还是急得跳着脚地不承认，结果这成了我是个爱撒谎的坏孩子的最好证据。

爸爸带回的苏联东西中还有一套塑料做的苏联各民族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立在一个蓝色的盒子的底面，个子比我的小指头还小，一共有四十多个。盒底是绿色粘绒做的，小人们的底部的两端用松紧带固定在粘绒上，可以把他们从松紧带中褪出来。我常常坐在收音机前，一边听音乐，一边把这些小人儿按我认为漂亮的程度男男女女配成对儿，然后自

已在心里给他们编些故事。我可以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一连玩上好几个钟头。

还有一样东西受到哥哥好朋友的热烈欢迎，那是一台幻灯机和四大盒幻灯片。记得有《公鸡和狐狸》的故事，爱听奉承话的公鸡没有记住主人的嘱咐，被狐狸的好听话骗出了窗台，让狐狸抓走了；还有《小红帽》的故事，老狼把奶奶吃了，躺在床上装奶奶骗来看奶奶的孙女小红帽，虽然谎话连篇，还是被小红帽识破了，叫来村民打死了老狼；还有小黑孩儿的故事，那是一个逃到了一艘军舰上的黑人小孩儿和水手们间发生的故事；但是幻灯片上的大多数故事都没有相应的中文故事书，所以我们无法猜出幻灯片上那些俄语的意思，哥哥的那些朋友就根据画面自己瞎编。后来爸爸让他的俄文翻译把幻灯盒上的名字都翻译成了中文，这样放的时候至少可以知道幻灯片的名儿了。

爸爸还给妈妈带回两个十分美丽的白色塑料盒子，一个画着皇后的黑漆盒和一块玫瑰红的花头巾。总之那些爸爸从苏联带回的东西，都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的，都那么让周围的人艳羡。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一个令我神往的国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爸爸能够带我去苏联看看呵。

二

除了这些苏联东西让我向往苏联，还有爸爸工作的水电总局的那些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让我感到好奇。他们和我们长得那么不一样，衣着也比我们好得多。爸爸那时常常请苏联专家到家里吃饭。碰到这样的日子，位于鼓楼根儿下的马凯餐厅的大师傅就会来家帮忙做饭。我们小孩儿是不能上桌的，只有向客厅探头探脑的份儿。那些苏联叔叔会带来苏联糖给我和哥哥。有一种小熊包装纸的巧克力糖，非常好吃，没想到四十多年后在美国的俄国食品店，竟然买到了一模一样的。还有一种圆圆的核桃糖，个子非常大，苏联叔叔剥开糖纸把糖塞进我的嘴里，我的嘴就被撑得一动也不能动了。融化的糖汁顺着嘴角往外直流，我得拼命地唏溜才能不让糖汁流到衣服上，一块糖吃完，嘴巴累得都麻了。

苏联专家是老换的，而那些大师傅是固定的，我对他们比对那些苏联人反而有更深的记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阶段，饭馆吃饭是不要粮票的，只是买一斤饭，必须要买一份菜。阿姨常常带我去马凯餐厅买米饭，那里有些大师傅还认得蔡阿姨，总友好地和她打招呼，似乎也总对她有些照顾，并不以李部长倒台而有所歧视。买好饭，阿姨总拨出一些米饭让我把菜吃了，她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自己从来不动筷子。我吃得香，她比自己吃了还高兴。每逢这样的日子，看到马凯的大师傅，我就会想起爸爸请苏联专家来家做客的好日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

苏联专家除了来家吃饭，周末爸爸还常常请他们和家眷出去玩。一般情况下，妈妈总是带着我和哥哥同去。记得去过颐和园，十三陵。在那些苏联孩子中，我只记得萨沙和莲娜，因为萨沙和我同岁，我和他在颐和园门口的铜狮子前一起照过像。萨沙的哥哥瓦洛佳和我哥哥同岁，是他的朋友。我到莲娜家玩时，她领着我到她的屋子，把她的一个塑料洋娃娃送给了我。那个娃娃的胳膊，腿和脑袋都是能动的，你可以把它们任意地转来转去，摆成各种姿势。妈妈教我给这个娃娃用毛线织毛衣、帽子和鞋子，她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一直到有一天因为我不断地寻求她的四肢为什么会转动的秘密把她的脑袋搞掉为止。

文革初期，社会上刚刚开始破四旧、抄家时，我们家曾有过一次自我破四旧，把那些会引起红卫兵怀疑的东西先自行消灭掉，萨沙和莲娜都被从同我的合影中剪了去。但是我们没有舍得毁掉那些幻灯片，搬家后把它们藏在过道间顶柜的最深处。可是在1968年的春天，妈妈机关来人抄家时不知被谁偷偷地拿走了，因为那时社会上流行一种用胶片制做的灯罩，这些幻灯片实是不可多得的原料。

后来上了小学，我们学校和苏联的哈尔科夫城的一个中学结成了友谊学校，那个学校派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生和老师的代表团到我们学校访问，带来了许多照片和苏联学生自制的玩具和他们的优秀作业，在我们学校的活动室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可惜我正好生病在家，没有遇到代表团。病好后回到学校，发现整个儿学校沉浸在炽热的中苏友好气氛中，几乎每个同学的手中都有一张苏联孩子的照片，那是他们通过代表团新交的苏联朋友。大

家一遍一遍地谈论着那个叫莲娜的女孩子有多么漂亮，简直像仙女。同学们热烈地议论着部里陪代表团来学校的领导说我们学校也要选派最优秀、最漂亮的学生回访苏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评为好学生，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因此可以成为回访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那个似乎不可及的去苏联看看的梦，一下子变成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我因为失去了直接结识苏联朋友的机会，感到非常懊恼，只好请求已有了苏联朋友的同学写信给她的苏联朋友，请她在她的同学中为我寻找一位朋友。不久我就收到了斯捷塔·波林采娃的来信。蓝紫色的墨水写成的斜斜的俄文字是那么的美丽、娟秀，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爸爸的俄文翻译帮助我把信翻译成中文，斯捷塔在信中形容了她所在的哈尔科夫城和她学校所在的伊凡诺夫街和她的校园，她把它们描写得像童话世界一样，我真是羡慕极了。我立即回了信，寄去了一张我的照片，表示希望也得到她的一张照片。我真希望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样我也可以拿她的照片向那些有漂亮苏联朋友的同学显摆了。

可惜我没有等到回信，中苏关系就恶化了，苏联似乎一夜之间从亲密的朋友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这又成了同学们间热烈讨论的话题。同学们彼此传议着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的消息，议论着我们中国有多么了不起，毛主席真是伟大，敢于向苏联老大哥挑战，很多同学愤怒地撕碎了苏联朋友的信和照片。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我将斯捷塔的信保存在我的装宝贝的盒子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怕它成为通苏修的罪状，才在那次破四旧的行动中万般无奈地撕了。真奇怪，那次砸家中我曾那么喜爱过的唱片时一点犹豫和留恋都没有，真心觉得自己是在与四旧断绝关系，可是对那封信，我却常常想起，总有一种隐隐的伤感。也许我苏联小说看得太多了，《红肩章》、《短剑》、《普通一兵》、《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母亲》、《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妈妈让看的，妈妈不让看的，只要能抓到的苏联书，我都会看得昏天黑地。

实际上，那时的市面上除了不多的几部中国小说，能够买到的最多的就是苏联的翻译作品了。我深深地被那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人的勇敢、忘我、正直、善良，还有姑娘们的

美丽和小伙子的魁伟而打动，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是我人生的榜样，我无法把他们和苏修划上等号。对苏联人的热爱，对那片土地的向往，在我真正踏上她的土地之前从未减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记得《红肩章》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学生向他的老师汇报了另一个学生做错的事情，等那个学生走了之后，老师对自己说，这个学生的人格是这样的卑贱，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面对文革中被煽起的中国人人格中最丑陋的一面，面对甚至朋友、亲人间的互相揭发、告密者受提拔重用，我愈加热爱那些小说中描写的高尚的苏联人。

三

1986年我第一次得到出国的机会，是到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八个月（后来因为工作没做完，又延长了一个月）。回国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乘火车，做一次横贯欧洲大陆的地面旅行。当终于踏上了那块我儿时起的梦想的土地时，我是那么的失望。那次我在莫斯科只逗留了短短的三天，却在警察局为了办临时户口耗去了整整半天。路上所遇到的苏联人，只要我稍稍接近他们，打算问路，还没容我开口，他们就一迭声地“喂、喂！”像躲避瘟神一样慌慌张张地快步走开。我看不到一张有生气的脸，更不要说在西欧已经看习惯了的人们脸上的灿烂阳光了。在红场旁边的大百货商场里，我看到了爸爸小时候给我们买回的一式一样的鹅和兔子，我差异得半天合不拢嘴。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即使改革才刚刚起步，各式各样色彩鲜艳，造型颇具创意的塑料充气玩具已充斥市场。真没有想到我们的老大哥二十年过去，还在原地踏步。我没有能在几乎空空如也的食品店的柜台上找到小熊巧克力和圆圆的核桃糖，这不但是踏步而且是倒退了。食品店里除了面包就只有象中国那时的食品店的猪肉一样，用刀砍着卖的黄油。坐在那黄油后面的卖货的“玛达姆”，跟那墩黄油一样，硕大无比。这就是我梦中的苏联人吗？那些英俊的小伙子在哪里，那些和善的老妈妈在哪里？尤其让我惊讶的是红场是那样的狭小和破败。我见到了躺在地下的

列宁，我赞赏地穴设计的简洁，不及毛泽东纪念堂堂皇的万分之一，但是气氛是阴森的。我尽量缓慢地走过列宁的灵柩，想把这个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的面貌看得清楚一些。这就是他吗？那个伟大的列宁！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仍如此贫穷。我心中那美丽的红色梦幻在走出列宁墓的瞬间飘离了我的心。

我从苏联回国不久，父亲通过萨沙的父亲，苏联专家库兹涅佐夫当年的翻译徐锐先生和库茨涅佐夫先生恢复了联系，俩位老人互通了离别半个世纪后各自的经历。库兹涅佐夫深深敬佩父亲的品格，父亲也说库兹涅佐夫是当年所有的苏联专家中学识最好、待人最温文而雅的一位。1990年我准备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坐火车经前苏联去当时的西德。给萨沙打了电报，萨沙立即回了电报，告诉我，他会在莫斯科火车站接我们。经过五天半的旅行，我和女儿在中午十分到达莫斯科。我们开始在月台等，人都走光了，还不见萨沙的影子。只好叫了个搬运工，把行李装上车往站外推。快到站台出口，见一个青年向我们走来。双方都有些犹豫，我是觉得对方面相太少，不像四十岁的人，对方则可能觉得我太老？但是我们都还是站定了：“萨沙？”对方立即迎了上来：“你好！”，哈，他居然会说中文！我拿出了写有他家地址的信封，他掏出了我打给他的电报。三十五年之后，这对在颐和园门前合影的“小朋友”双手紧握在一起，颇有梦幻之感。萨沙一手一个拎起了我的两个箱子，就径直向车站外走去。我们在他夫人的姑姥姥家洗了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当晚萨沙就带着我们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库兹涅佐夫老人在车站迎候我们，他轻柔地牵起我的手吻了吻。这种吻手礼节，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从苏联小说上读到过，当时那种受到如此的尊重、如此的礼遇的震撼，至今仍能回忆得出。

老人有一辆“小华沙”，萨沙帮助我们行李放在车上就走了。我们和老人一同回到了他的公寓。他住的是高层建筑，楼道的清洁和电梯的质量（没有电梯工）要比1990年的中国强得多。他的夫人维拉在家里迎接我们，我们人还没有进门，就被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他们住的是两间卧室的单元，一大一小，为了我们的到来，两位老人把小间的卧室腾给了我们，自己在平时作为客厅的大间临时搭了一张床。房间的装修和家具，特别是厨房

的面积和设施比那时的中国不知要强多少倍，公寓区的绿化和高楼间的小游乐场被我刚满十岁的女儿称为天堂。但是食品、百货的供应仍然几乎是零。第二天，我们还在睡梦中，被关房门声弄醒。起来一问，方知库兹涅佐夫已经从市场上回来。他是四点钟去的商场，整整排了三个钟头的队。那时苏联买一样东西要排三次队，第一个队是开票，第二个队是凭票付款，第三个队才是用付款收据取要买的东西。三个钟头买回的是六个鸡蛋。库兹涅佐夫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东西招待你们，只买到这几个鸡蛋。列宁格勒十月的清晨已经要穿大衣了。看着老人手中小心捧着的那半打鸡蛋，体恤着他一身的寒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女儿以后每每说起库兹涅佐夫爷爷，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三个钟头凌冽寒风中排来的六个鸡蛋。那个中的爱，曾经那样地温暖了出奔异国他乡，前途茫茫的我和女儿的心。

老人后来给我看了他获得的列宁勋章，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的所作所为太让他失望了。他的大儿子瓦洛佳第二天来看我们，一进门就把我和女儿紧紧地拥抱在怀里。我立刻感到了苏联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俄罗斯人特有的热烈的情感，眼睛一下子热热地涌满了泪水。瓦洛佳和库茨涅佐夫带我和女儿去了列宁格勒公墓，那里埋葬着50多万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战死、饿死的军人和平民，库兹涅佐夫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哥哥就是那时饿死的。他告诉我平均每个家庭都要死两、三个人，人们被围在城中，不能出城，要与城市共存亡。公墓进门处燃烧着永远不熄的地火，墓碑一个紧挨一个，空中轻轻飘动着哀怨的俄罗斯乐曲。老人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缓缓地从碑林中走过，事过半个世纪，我仍能感到他和瓦洛佳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我告诉库兹涅佐夫，俄罗斯有过太多的苦难，这和我们中国十分相似。我们仍然在受苦。他说他听说了天安门前的流血，他理解我为什么会离开中国。他告诉我他这辈子只记得有两个时期不为食品发愁，一个是1924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再一个就是50年代初在中国，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永远记得我父亲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好。他后来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对我父亲的命运也有耳闻，他为我父亲能活过那苦难的岁月而高兴，他为能在苏联见到李锐的女儿而无比荣幸。

库兹涅佐夫和维拉还领着我们逛商店，空空如也的柜台，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尴尬。我为女儿买了一个粉色的大大的塑料圆圈耳环。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维拉为我们买了几块硬硬的小点心，她抱歉地说，以前不是这样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和咖啡。可是那以前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我们在一个类似北京友谊商店，只能用美元买东西的地方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黄色的小鸡闹钟和一个腊做的小女孩，算是给女儿来过苏联的纪念。

到继续我们旅途的时候了，库兹涅佐夫和萨沙送我们去上开往东柏林的火车。萨沙告诉我，只有头一节车厢是去西柏林的，火车在东柏林大约只停十五分钟，你们到时要快些跑到第一节车厢，进了车厢，列车员来问，你们只要给他十个美元他就不会赶你们下车，可以一直坐到西柏林。火车拉响了汽笛，到分手的时候了，我期待着老人紧紧地拥抱我。但是他没有，他还是轻柔地拉起了我的手，还是那样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眼中含着泪对我说，“你是你父亲的女儿，你很勇敢，你会带着女儿顺利地到达美国的。到了那边一定要给我们来信。”火车开动了，老人脱下他的帽子挥动着，火车催动的风吹起了他的稀疏白发。我一直不觉得这会是永别，我总觉得我还会回到那个城市去看他和维拉，瓦洛佳的一家，萨沙的一家。后来我们一直通信，在信中老人总是抱怨生活很苦，看不到希望。一直到2002年的圣诞节，一切似乎突然变了，老人的信中充满了阳光。萨沙为他们在乡下盖了幢别墅，他们的退休工资可以使他们过得十分富裕，一切都有了。就在我们计划着全家去俄罗斯旅游看望老人的时候，万没想到2003年的4月20日的深夜接到他的孙女欧嘉从圣彼得堡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她的爷爷一个星期前去世了。在长途电话里欧嘉对我说，生活刚刚好起来，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令人兴奋的变化，爷爷却走了。我问她老人得了什么病，她说是摔了一跤，摔裂了盆骨，住院时转成肺炎，是在睡眠中安然去世的，没有经受很多痛苦。我闭上眼睛，面前又浮现出那随风飘动的稀疏白发，象一片白云。

四

2003年的夏天，我们全家还是去了俄罗斯。女儿在莫斯科的医院有个研究课题，我和先生也就顺便一游了。先生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我则是第五次了，最后一次是1993年因公出差。十年过去，俄罗斯的变化很大，商店里的东西应该说应有尽有，可是价格贵得吓人。我和女儿在一个鞋店的橱窗看到一双式样不错的凉鞋，我俩打赌说不会超过六千卢布（二百美元）。可是我们错了，进去一看标价，竟然要两万四千卢布，真是天价！人也变了，变得很淡漠，变得只认钱，没有什么友谊了。我在美国就一直给萨沙打电话、发伊妹、发传真，联络手段比当年的电报先进多了，可是萨沙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到了圣彼得堡，在我多次电话一再要求下，萨沙才定下了让我们造访他家的日子。萨沙搬了家，他所在的公寓区已没有了十年前的美丽，用惨不忍睹形容绝不过分。因为刚刚举行过圣彼得堡建城三百周年大典，公寓楼群临街的一面都粉刷一新，而进到小区里其破败不堪跟十年前女儿形容的天堂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处都是肮脏的水坑，垃圾遍地，楼的外墙涂料斑驳陆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萨沙的家倒是装修得比十年前好多了，壁纸、地板、家具，能看出萨沙很有些钱了，而且他还有了一辆吉普车。萨沙的女儿欧嘉拿了她的通过伊妹向我要的一套保养皮肤的贵重香脂，在饭桌上没有坐多大一会儿就告辞了，说她还有事情，这使我十分意外。萨沙的小儿子说是在乡下奶奶的别墅给奶奶看狗，也没有来。我们没能见到那么想见的瓦洛佳一家，因为萨沙不愿意为我们联系。瓦洛佳一句英语不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只有维拉老太太还是那样热情，见到我们就哭了，抱着我不放手。吃饭时萨沙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抱怨今不如夕，对普金大加批判，说他什么也没有做。倒是老太太突然地冒了一句：你们不要老是发牢骚，我看现在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招待我们的午餐是让我女儿猜到了，顶多有几片西红柿和黄瓜，然后就是面包、黄油和肠。俄罗斯的青菜太贵了，一个袖珍小圆西红柿相当于两块多人民币，而俄罗斯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不到一千人民币。等到吃过饭后的巧克力和点心，喝过茶，努力营造的谈话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我们知道是到告辞的时候了。我紧紧地拥抱过维拉，老太太又哭了，不愿意放开我的手。和萨沙的夫人客气地握过手，萨沙送我们到地铁站，

在那里我们和他客气地握手告别，没有了十年前的恋恋不舍。我们三个人在地铁车里好长时间都默默无语，我后来问先生和女儿：“你们还会想再来俄罗斯吗？”女儿说：“多半不会了。”先生说：“我还想再回来看看夏宫，但是会从芬兰入境，当天来当天回。”他们谁也没有提再回来看看萨沙一家。这纵跨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吗？

我的俄罗斯梦啊！■

【述 往】

独酌翁自述——英国特嫌

梁沪生

“早八时，刚刚起床，突然凄厉的警报笛声四起，……接着很清晰的轰炸声音在九龙的东北角爆发，上空嗡嗡的飞机声，跟着也历历可闻。”这是当时的著名报人萨空了先生在《香港沦陷日记》中对香港沦陷前的记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开始进攻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12月25日全面占领，香港沦陷。

自小在香港长大的L君，此时才20岁出头，就职于英国人的太古船厂，在一艘轮船上担任轮机员的工作。L君因与父亲、继母不和，十几岁便离家勤工俭学，经过自己努力，毕业后就谋到了这份还不错的职业。没想到日本人打来，传统的大英帝国没有了不可侵犯的傲气，举起了白旗将香港拱手奉让。在日本人全面占领之前，轮船的英国船长就对L君说，我们准备将船沉入海底，全体员工都要疏散，小兄弟你可以另谋高就去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开个证明书，证明你曾经为我们大英帝国服务。

失去了工作又无家可归的L君，决定跟着逃难的人潮，离开香港到祖籍地广东番禺去。跨越罗湖穿过当时还是个小渔村的深圳，几经周折跋涉却来到了广西的桂林。流落桂林街头的L君已花完了英国船长发的疏散费，囊中羞涩之际却掏到了临别时船长给开的那张证

明。说来也巧，桂林恰好就设了英国的领事馆。病急乱投医，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L君闯进了英国领事馆。结果喜出望外，凭着这份证明，英国领事馆竟然就发放给他一小笔足够维持一周开销的生活补贴。

解了燃眉之急，还得谋个长远之计。L君踟蹰桂林街头，看到了机会的曙光。报纸上刊登了中国航空公司（中航）战时聘用员工的启示。启示中写明聘用要求一、二、三……其中识英文一项，在香港长大且在英国公司干过，自然不成问题。但要求有航空基础知识，则有难度。于是临时抱佛脚，带着面包在街头旧书店蹲了几日，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居然顺利过关录取航空地勤，而且立马出国——印度加尔各答。

著名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抗日大后方重要的运输补给线。中航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年来多有宣传，不必赘言。

抗战胜利，L君随中航公司回国迁至上海。1948年因国共内战，又随公司迁至香港，回到自小长大于斯的地方。

1949年11月9日凌晨6点，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北飞。带头那架“空中行宫”XT610号，是四十年代后期时速最快、设备最完善、具有恒温舱的美国康维尔新型客机。“空中行宫”降落于北京，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的两位总经理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迎接。另外装满航空器材的十一架飞机，降落在天津。

在中共的策动下，在香港的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宣布起义，全体脱离国民党归附在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

当时毛泽东的贺电，原文如下：“中国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总经理，及两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两航起义的其他三千余员工留在香港待命。很多人闲来无事，另谋职业以养家糊口。

一些私人企业也觊觎两航的技术人才，趁机来挖走了一些人。L君此时也被一家小型的航空公司挖去上了几天班，终因不适应又离开了。

1950年1月16日，人们从香港各处汇聚在尖沙咀的九龙车站，携眷带口，由起义的领导者领队北上。L君一家四口也在其中。火车鸣响汽笛，隆隆启动，在广九线上北行。窗外掠过沙田、马料水、大埔、粉岭……抵达罗湖。

宽不过五十米的罗湖水面，是大陆和九龙分界的自然水域，一座罗湖桥把香港九龙与大陆连接。此刻，它又被人为地隔离。广州已于三个月前被解放军占领，广九铁路的咽喉通道被切断。人们只得下火车，来到罗湖桥头，列队接受港英军警的过境检查。

桥这边，挂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

检查，放行，人们陆续走上桥头，向桥那边走去。那边桥头，大陆新政权的五星红旗在飘扬……

在新政权下，这些两航起义的参与者被分散各地。

L君先被安排到天津学习，然后分到太原221厂（应该是一家飞机修理厂），然后哈尔滨—太原—成都—上海—成都，多次全家迁徙调动。终于于1959年在成都的132厂（现名成都飞机公司）站稳脚跟直到退休。

1966年开始的文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航起义人员，均遭不公对待。L君也难逃厄运。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再次审查历史（那个年代的人无不有向党忠诚老实，交代历史的经历。还有历史清楚和历史清白之分。），他被军管会和革委会“揪”了出来，成立了专案组，人也关进了“牛棚”。因为抓阶级斗争，抓出了一条隐藏多年的大鱼。被视为“清理阶级队伍”重大成果。

他的罪名很独特：英国特务嫌疑。这当然跟他的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历史有关。

证据何在？一，抗日战争期间逃亡到桂林，凭什么英国领事馆要发给你生活补贴？什么生活补贴？明明就是去领取特务津贴！二，起义后，为什么脱离队伍两周后又回来了？显然就是回大陆之前去接受特务任务去了！

关“牛棚”、审讯、羞辱、劳动改造……一番折腾后的结局是轻描淡写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放人，后来还有什么“落实政策”之类。

这位“英国特嫌”L君便是家父。一个普通的尽职的工程技术人员。历来不苟言笑，从小到大，与我并无多少心灵上的沟通。他过去的经历，还是在进了“牛棚”以后，我去探望他时，才第一次对我讲述。当然相比起很多很多在文革中被羞辱、被殴打、被迫害致死的名人和平民百姓来说还是幸运的。起码能够在退休之后还过了近30年的安闲的日子。从没听到过他对那段经历口吐怨言。

2008年，已经88岁高龄的家父躺在成飞医院的病床上，生命垂危之际，突然回光返照，发疯从床上跃起来，冲出病房，无论如何也拽不回来。他指着病房里另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带着惊惧地喊：“就是他……江西人！……”

后来明白，当初在搞英国特嫌专案整他的就是个江西人，但此江西人非彼江西人，他冤枉这位病友了。是幻觉？还是噩梦？临终前依然缠绕心头的噩梦？■

附记：关于两航起义后到北归大陆的情况，我曾撰写长篇纪实小说《省港风云——两航起义在香港》（江南文学双月刊1987第6期和1988第1期连载）。采访过参加两航起义的多名成员，包括1981年还在中央戏剧学院求学期间，在北京饭店采访了起义时驾驶“空中行宫”XT610号到北京的潘国定，他是当时中航里极少的中国人正驾驶的第一人。后来也是他，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第一人。他同样文革受冤，刚落实政策。采访他时，正悠闲地在东单口上的北京饭店喝咖啡。那时候可不象现在这样遍地咖啡馆。■

【读者来信】

1. 成岗：《前世与今生》中关于“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解释有误

《记忆》235期《前世与今生》一文似有一小错，即对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叙述正

好相反了。充要条件的叙述方法源于数学，必要条件说的是，条件满足，事件不一定发生，只是最起码的条件；充分条件说的是，条件满足，事件一定会发生。因此充分条件一定包含必要条件，而必要条件不一定包含充分条件。在数学上，两者重合，则称为充要条件。所以文章应该说，新闻自由是防止饥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过，其实新闻自由与饥荒真没什么内在联系。■

2. 皮皮侠：为文浩之书点赞，为陆凌之文叫好

原来我只知道中国饿死了人，读了文浩《饥荒政治》才知道，原来苏联也发生过大饥荒，也饿死不少人。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里面，就有饿死人是硬道理一条。文浩，一个德国人，用他的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化自信”。

陆凌我也很敬佩。我以前在贵刊上读过陆凌的文章，知道他一直关注这个课题。据我所知，中国人研究这个课题的，国内有杨继绳、曹树基，国外有丁抒，不知道陆凌在国内国外。不管内外，他的名次应该排在第四。但他年纪最小，应该是最小中的第一。

整天听央视说四个自信。最后一个文化自信。不敢让人家研究当年饿死多少人，研究出成果不准讨论，还要闭嘴，这叫文化自信？■

【封面说明】

红色五线谱

邹行

1966年中共中央公布的第一批十首毛主席语录歌。

这个五线谱选自其中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钢琴谱第二小节。

其音符的造形，选自文革海报中手持毛主席语录的青年战士。

此曲悠扬，但音调如思想一般单调，节奏如着装一样统一。■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